

##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1948年,在解放连云港的战斗中,有一支英雄的部队,他们从板浦打到南城,从新浦打到连云港海边。1949年春,这支部队奉命南下,参加西梁山战斗,打响了渡江战役第一枪。是役,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献出了年轻的37岁生命。这支部队的名字:灌云县独立团——三野30军90师270团。团长:朱慕萍。《英勇顽强铸丰碑》一文,献给朱慕萍团长诞辰100周年。

他是一名革命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荣获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他是一名作家,从事文学创作63年,亲自撰写和主编的著作逾千万字,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表彰。他是一名军史研究专家,著有《罗炳辉将军传》、《项英传》、《新四军简史》、《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等7本书和200多篇文章,被誉为党史军史“活辞典”。他是谁?请看本期“港城将星”——《王辅一将军——矢志不渝为党和军队书写辉煌》。

翻开清代有关海州的史籍,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至乾隆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逐步复苏,特别是以板浦为中心的盐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繁荣,涌现出一批才华卓著、灿若星辰的作家和学者。其中的凌廷堪和李映庚就是两位深有影响的音乐大家。市艺术研究所朱秋华老师的《记清代海州地区的两位音乐大家》,将告诉读者隋唐燕乐探源者凌廷堪、现代军乐创始人李映庚的卓越贡献及他们与海州的关系。

温暖的春风,吹开了山海相拥知名旅游城市的大门。我市独特的山海景观、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认同和赞誉。国家AAAA级景区花果山游人如织,三元宫殿前香火缭绕。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玉女峰东侧青峰顶北坡悬崖下,曾有一寺,名曰北海观音寺。该寺悬崖构殿,上傍绝壁,下临深壑,仿若天上宫阙,人间仙境。在其香火鼎盛时期,修真学道几近百人。该寺庙毁于清顺治年间靖边裁海,现只剩一片废墟。此寺建于何时?史籍无载。其开山僧何人?州志、山志皆有记述,但各有其人,说法不一。张茂田的《北海观音寺谁是开山僧》一文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历史的真实。

1953年春天,苏鲁边界两侧的东海、新沂、沭阳、郯城、临沭等地相继出现了“水鬼”、“毛人”事件,由于阴森可怖,流言不脛而走。东海境内,一时风声鹤唳。街头巷尾走亲串友,一开口,往往就是“水鬼”、“毛人”,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大大小小的乡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东海县委、县政府要求各区、各乡要充分依靠党员、团员、基干民兵,放手发动群众,抓住苗头,理清线索,瞅准机会,果断出手,揭开谣言的谜底,掀开“水鬼”、“毛人”的盖头。王宗富老师的《东海县“水鬼”、“毛人”事件的发生和平息》一文详细讲述了东海县“水鬼”、“毛人”事件的全过程。

连云港史志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江行舟  
刘畅征 许燕臻  
杨春生 李洪甫  
张学贤 张良群  
彭 云 韩世泳

主 任 李 东

副 主 任 张 斌  
朱 瑞  
陆瑞萍

委 员 (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忠新 王 滨  
刘 鹏 邱仕明  
何洪斌 姜龙才  
董恕志 韩翠林

主 编 李 东

副 主 编 张 斌  
朱 瑞  
陆瑞萍

责 任 编 辑 邱仕明

张伟敏

文 字 总 校 张俊鹏

■ 卷首语

本期导读……………本刊编辑部 1

■ 港城将星

王辅一将军——矢志不渝为党和军队书写辉煌  
……………邱仕明 张伟敏 4

■ 地方文化研究

记清代海州地区的两位音乐大家……………朱秋华 7  
徐积和他的《东海大松歌》……………伏广喜 10  
从大浦地名说起……………蔡立志 13

■ 人物春秋

英勇顽强铸丰碑——纪念朱慕萍诞辰 100 周年  
……………关 仁 15

■ 历史考证

连云港早期党组织领导人……………刘成文 19  
雪轩别墅建于何时……………张树庄 21  
北海观音寺 谁是开山僧……………张茂田 24

■ 历史与发展

精彩水晶 晶彩东海……………尹品端 王荣久 27

## 封面介绍



## 民国建筑:连云港火车站

位于连云区连云镇中山路北下侧。始建于1933年,建成于1935年。西洋式平顶建筑,钟楼设于东端,远视如船形。办公楼四层,钟楼十层(含地下室),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占地1170平方米,实用面积3000多平方米。该楼原为连云港港口和车站的共用办公楼,由原国民政府陇海铁路管理局承包给南京复兴公司下设的方纪公司负责施工建造。该楼是连云港建港初期建筑之一,对研究连云港港史、连云港市经济发展史和中国海港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往事追忆

- 老书记亲自撰文稿…………… 许燕鑾 31  
 难忘五年共事情——忆老总编陈天柱同志  
 …………… 张学贤 33  
 我印象中的刘洪石馆长…………… 黄正明 36

## ■史海钩沉

- 东海县“水鬼”、“毛人”事件的发生和平息  
 …………… 王宗富 38  
 火车时刻表见证陇海铁路的发展…………… 张大强 41

## ■红色纪念地

- 板中二女杰雕像…………… 本刊编辑部 43

## ■风物览胜

- 话说白虎山庙会…………… 孙大伟 44  
 古城海州的关帝庙…………… 杨维英 46

## ■党史博览

-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4-6)  
 …………… 本刊编辑部 47

2012年第2期 总第80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 址:连云港市新浦区朝阳东路69号  
 邮 编:222006  
 网 址:www.lygsz.gov.cn  
 电子邮箱:Lygshitan@163.com  
 电 话:(0518)85825137 85821368  
 印 刷:连云港市市级机关印刷厂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JS-G033号  
 出版日期:2012年4月

# 王辅一将军—— 矢志不渝为党和军队书写辉煌

邱仕明 张伟敏



## 人物简介

王辅一，1929年7月出生于赣榆县城头镇东大坊村。194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为青年党员)。1944年8月入山东滨海中学学习。1945年1月被选调任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政治部缮写员，参加了反“扫荡”和大反攻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洛阳、开封、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政治部秘书、科长。1969年起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1981年任百科编审室主任，组织编撰和编审《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条目，任解放军军史学科副主编，所写[项英]条目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肯定和赞许。1987年12月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副主任、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参与组织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1990年6月离休。1992年6月被评为研究员。

## 战火纷飞、挥笔为枪，迎来新中国诞生曙光

1939年2月25日，侵华日军从安东卫登陆，27日占领赣榆县城。日军在朱堵等地设立据点，最近的据点离王辅一家只有10里，非常危险。1940年1月6日，王辅一的家乡被八路军解放。在中共赣榆县党组织领导下，庄上迅速建立抗日群众组织。此时正上小学五年级的王辅一当上了儿童团团长。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巡逻放哨，宣传抗日。

那时，王辅一身上时常带着两样东西：一个是陈云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小册子，另一个是区委书记送给他的小手榴弹，一旦发生情况，随时准备和鬼子同归于尽。没多久，王辅一又担任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晚上时常参加放哨巡逻。“毕竟那时还是孩子，漆黑的夜里，心里也有些怕，又离日伪据点那样近。每到后半夜，为壮胆，也为吓唬敌人，就常在煤油桶里装着点燃的鞭炮，像机关枪一样噼里啪啦地响，让日伪军摸不清情况，不敢出来。”

1944年8月，经考试和推荐，王辅一进入山东滨海区创办的滨海中学(实为滨海干部学校，今山东临沂大学前身)学习。1945年1月初，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从滨海中学中选调一名学员，王辅一从400名同学中脱颖而出。从此，王辅一穿上军装，当上缮写员，开始了一生扛笔杆子的革命之路。战火硝烟中，他刻钢板、印文件，参与《民兵报》的刻写、油印工作，用一支笔与“扫荡”的敌人作战。

解放战争打响后，王辅一调至山东野战军(后改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任技术书记、秘书、机要秘书，随唐亮首长转战苏、鲁、豫、皖诸省，出色完成任务。参加过外线出击和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洛阳、开封、睢杞、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流血牺牲。1947年9月26日，王辅一随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跨过陇海线，进至河南夏邑的第二天，由于长时间的劳累，连续几夜没合眼，王辅一在与唐亮首长画当晚行军路线图时，突然昏厥。他还多次遇到险情，经受住战火的洗礼。战争年代的磨炼，让王辅一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使其“终生受益”!

1951年，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等首长为王辅一颁发了二等功的奖状。1957年，王辅一

被中央军委授予三级解放勋章；1990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2007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紀念章。

### 潜心治史、呕心沥血，书写共和国将帅辉煌

战火的淬炼、多年的磨砺，使有着长期在我军高级将领身边工作特殊经历的王辅一，成为不少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对我党我军各个时期的人物典故更是了如指掌。每逢有人在研究党史军史和著书立传遇到困难时，会来电话或找上门来，他都热情解疑答难，堪称党史军史“活辞典”。

1981年至2011年，王辅一先后出版了《罗炳辉将军传》、《罗炳辉的故事》、《项英传》、《新四军简史》、《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为将帅书写辉煌》、《近看项英》等7本书，在各类报刊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其中为陈毅、罗炳辉、周子昆、唐亮、萧望东、杜平、向守志、周贯五、刘西元、饶子健、李超时等11位将帅写出传略，为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3位国家主席百年诞辰时应邀写出纪念文章，为许世友、袁国平、韦国清、张爱萍、黄公略、赵熔、廖容标、吴仕宏、陈锐霆、杨斯德、王必成等11位老将写出专题业绩文章，共460多万字；主编和参与主编了《新四军事人物录》、《军事大辞典》等7本书共610多万字，帮助军队和地方或老首长编写、编审了10本书和一批传稿共420多万字。

当我们问及王老何时开始研究项英时，王老回忆说，那是1981年他任南京军区司令部百科编审室主任时，受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撰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项英]条目。条目仅需1100多字，但由于项英当时还戴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是个敏感人物，因而要客观准确地反映项英的一生，难度可想而知。

按照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王老没有为原来对项英上纲上线的框框所束缚，而是用事实讲话，从掌握的第一手史料入手，搞好调研和史料准备。他跑遍国内著名的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广泛收集、汇总、筛选、分析、鉴别史料；以征求意见稿形式摸清熟悉项英的元老们、知情者和党史部门对他的看法，查清了影响项英业绩评价的主要史料，经过慎重思

考和整理，重新撰写出项英条目。

1984年12月，总政治部百科编辑室将经专家会审后的项英条目送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了3处批示，在“皖南事变”一节旁批：“这个评语看来可以了。”胡耀邦对这件事很慎重，又批交当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再仔细斟酌一下。”胡绳召集专家研究后，向胡耀邦报告：“我们认为，这一条总的说来是写得恰当的。”与此同时，中央军委领导人杨尚昆、余秋里也对条目均表示同意。就这样，条目被定了下来。

1986年1月，在皖南事变和项英牺牲45周年时，《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通讯》《军史资料》《革命史资料》3家刊物同时刊发[项英]条目，立即在史学界和新四军老同志中引起很大反响。国家高教部当年专门开会，要求高校今后党史教学中有关皖南事变的讲解，以此条目为依据。

可是情况突变。1987年1月胡耀邦离任后，有人说[项英]条目是为项英翻案，王辅一受到批评，甚至下来都与此有关，但他坚信按照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评价历史没有错，对项英的研究更加认真地进行下去。

1990年6月，王辅一离休。9月1日回到南京后，他在没有经费支撑、家里还有病人需要照顾的情况下，顶着压力继续着项英的研究，经过13个春秋，解决了项英研究中的诸多疑点和难点问题。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审定、中共党史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了42万字的《项英传》，为党中央重新评价项英业绩提供了史料。

1998年5月13日，经党中央批准，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举办“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王辅一应邀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在代表中央和军委讲话时，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对项英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从1981年写条目起，王辅一对项英的研究30年来没有停顿，陆续为项英写出传略、传记和专题业绩文章，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项英传》《近看项英》2本书，还担任了军事科学院组织编辑的《项英军事文选》的编委和特邀编审，

参与了这本近 60 万字文选编辑的全过程,将项英的革命业绩和实践展现在读者面前。

70 多年来,王辅一将军坚持学习,勤奋工作,多次立功受奖。参与编审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分册,1992 年被军事科学院评为全军科研成果一等奖;参与组织编纂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卷本及分册,1997 年在全军第二次军事科研成果评奖中获特等奖。所写《罗炳辉的故事》,作为早陨的将星丛书之一,1993 年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 1992 年度精神文明产品“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1998 年,中央电视台根据《项英传》所拍《项英》电视片,任顾问,2000 年获中国电视广播学会第八届优秀军事节目专题类一等奖。2003 年 7 月 16 日至 17 日,中央电视台在《国防时空》栏目,以《国防人物·将军本色》为题,对他作了专题报道。2008 年 5 月,王辅一被山东临沂师范学院聘为教授。2009 年 9 月,被解放军总政治部评为全军先进离休干部。2011 年 4 月,解放军总政治部表彰他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从 4 月至 9 月,《人民前线》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和广播、电视等媒体对他作了连续宣传报道。

2011 年 1 月 12 日,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在给王辅一的来信中写道:“您对我党我军历史的研究造诣颇深,是闻名军内外的军史专家,是新四军军史研究的权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您离休 20 年来,始终没有放慢为党、为国家、为军队奉献的脚步……您老当益壮、老有所为的奋斗精神,您矢志不渝为党和军队书写辉煌的执着信念,非常令人钦佩,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 少小离家、情系故土,期盼连云港崛起腾飞

王老将军今年已经 83 岁高龄。老人家对他养他的故乡充满感情。可是因为革命和工作的需要,他从参加革命起离开家乡,到目前,只回过老家 3 次!甚至连父母去世,他都没能回家。说到这儿,老将军的眼角湿润了,老将军说,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父老乡亲们哪!忠孝实难两全!虽然家人及亲朋没有责怨我。可是,我自己,却感到是终生最大的遗憾!我只能用更好地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实践,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父母,告慰乡亲。

王老将军第一次回家是 1950 年秋。当时王辅一所在部队接上级通知,准备出征抗美援朝。

首长知道他在战争年代没有回过家,就要他赶快回家去看看。王辅一到家后,与父亲促膝长谈,详细介绍了这么多年来在部队的战斗和工作情况,并将自己平时积攒的津贴费给了父亲。得知弟媳要生产,特意买来红糖和草纸等用品。后来改由彭德怀将军率部赴朝,因而王辅一所在的部队就没有出兵。

王老将军第二次回故乡是 1979 年。当时南京军区在连云港举行战役集训。军区首长知道王辅一老家就在赣榆县,就安排车,让他回老家看看。那天下午出发,一直到半夜,王辅一才找到老家。第二天凌晨四五点,王辅一就起床跟随乡亲们下田体验生活,家乡的一切都让他备感亲切。一直到 8 点多才回到家吃早饭。早饭后,在两个弟弟的陪伴下,王辅一来到父母墓前,禁不住泪流满面,“爸、妈,不孝儿回来看你了!”王辅一在双亲墓前低头沉思,久久不愿离去。近午时,周围的父老乡亲听说王辅一回来了,都涌到他家,问这问那,一顿饭吃了好几个钟头还未吃完。考虑到部队有要事等他回去办理,王辅一只好匆匆告别亲友乘车归队。

第三次回家是 1986 年,王辅一从南京军区调北京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前。那次回老家,适逢城头大集,王辅一在亲友们的簇拥下,逛集市,满眼看到的是质朴的老乡,满耳听到的是熟悉而又陌生的乡音,感受到了浓郁的乡情。

谈到家乡连云港的发展,王老将军说,改革开放以来,连云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他没能亲眼看到,但他通过报纸、电视,一直关注、关心家乡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连云港的发展进入了国家战略层面,多重战略机遇叠加。他衷心希望家乡人民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连接南北、纵贯东西的自然条件优势,发挥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的龙头地位,利用丰富的海洋、渔业、滩涂资源,实现后发先至。同时要加大对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力度。抗战时期连云港和陇海路以北属山东,是老革命根据地,要充分发挥抗日山烈士陵园等红色旅游资源的教育功能,着力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我们邀请王老将军在方便的时候回故乡视察,老将军高兴地说,有生之年,我一定再回去一趟,亲眼再看一看家乡的巨大变化!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工办)

# 记清代海州地区的两位音乐大家

朱秋华



凌廷堪画像

翻开清代有关海州的史籍,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至乾隆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逐步复苏,特别是以板浦为中心的盐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繁荣,涌现出一批才华卓著、灿若星辰的作家和学者。其中的凌廷堪和李映庚就是两位深有影响的音乐大家。

## 隋唐燕乐探源者凌廷堪

凌廷堪(1755—1809)字次仲,是清代杰出的经礼学家、音律学家和戏曲理论家。他祖籍为安徽歙县,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也将他列入“流寓”之中。其实凌廷堪的祖父虽是歙县人,但祖母却是海州板浦许氏,他祖父去世后,其父凌文昌即迁居板浦外祖父许世英处,“系海上灶户”,即从事海盐生产的专业户(见张其锦编《凌次仲先生年谱》)。凌廷堪不仅出生在板浦,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州度过,许多重要著作也都在海州完成,海州钟灵毓秀的山川哺育了这位才情横溢的学者。故《胸海诗存》中说他“世居海州板浦”,钱泳编著的《履园丛话》中也记载:“凌仲子名廷堪,海州板浦人”。凌廷堪的人生可谓坎坷,史书说他“六岁而孤”,失学后试图经商而不成。少年的困顿并没有压垮他,反而使他发奋读书,全凭顽强的毅力和天资的敏慧,终使他学有所成,“词曲一套,无师自通”、乃至“淹贯百家”。他35岁中进士,54岁卒于歙县。

凌廷堪一生的著作可谓浩如烟海,他对经礼、历算、

天文、音律、诗词等方面均有精辟的见解。他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典籍和诸子，从而成为清代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他的诗歌钱泳谓之“沉博绝丽”，他的骈体文梁启超谓之“力浮鲜艳，如其学风”。清代李斗著《扬州画舫录》中用了整整三页的篇幅，介绍凌廷堪在历算方面的成就。小说《镜花缘》作者李汝珍从河北迁居板浦后，自称“受业于凌仲子夫子”（见《李氏音签》），足见他学业渊博，造诣之深。

凌廷堪与戏曲有着不解之缘。据《扬州画舫录》载，“清乾隆丁酉（1777）年，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改曲剧……凡四年事竣。总校黄文暘、李经，分校凌廷堪、程枚”。当时年仅22岁的凌廷堪，和他的板浦同乡、剧作家程枚一道参加清帝乾隆钦定的“曲改局”，整理和删节历代戏曲作品一千多部，为《曲海总目》这部巨著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凌廷堪所著的《校礼堂诗集》中，录有“论曲绝句”32首。他以诗歌的独特形式，信手拈来，纵横捭阖，对元、明、清三代数十位戏曲作家及其作品、音律、演唱，以及戏曲的起源、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系统地进行了评介，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实为我国传统戏曲论著中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书目文献出版社在《历代咏剧诗歌选注》一书中，收录了他“论曲绝句”30首。

真正奠定凌廷堪重要学术地位的，当属他的扛鼎之作《燕乐考源》。燕乐亦称宴乐，即我国隋唐时代宫廷中饮宴时所演奏的歌舞音乐，它原为雅乐的一部分，至隋唐后渐渐加入汉族俗乐与外族音乐的成分，内容日渐丰富。我国历史上，隋唐时期的几位帝王酷爱音乐，他们不仅组织规模宏大的宫廷音乐机构（人员多达三万），征调各地音乐家担任乐工，有的还亲自作曲担任教练，在宫廷的饮宴活动中演唱或演奏，燕乐也成为宫廷音乐的泛称。燕乐在长期实践中创造了一套记谱方法和一套宫调系统，形成我国古代音乐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历代研究燕乐的学者颇多，但也出现一些杂乱的概念。凌廷堪

所著《燕乐考源》收集了隋、唐、宋、辽各代大量的音乐史料，通过比较分析，论证了唐代以后燕乐乐律演变的过程，提出了燕乐应为四宫28调之说。全书共六卷，首卷为总论，卷二至卷五分别论述了宫、商、角、羽四宫各七种调式，卷六为后论及附录。尤为可贵的是，该书还通过校勘的方法，指出历代音乐史料中的一些讹误之处，为后代研究家所认可。《燕乐考源》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它纠正了宋代以来许多儒者的偏见，澄清了中国古代乐律发展史上一些混乱的理念。近代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史书中都开列了《燕乐考源》的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在“中国古代音乐典籍”栏目中将《燕乐考源》列为压轴之篇，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 现代军乐创始人李映庚

大约上世纪80年代末，时在淮阴市主持戏曲志编纂工作的李志宏先生来访，并送我一部石印《军乐稿》复印件，署名作者为海州李映庚。我手捧这份厚重的工尺谱复印件十分惊喜，始知海州还有这么一位音乐大家。近年来，已任宿迁市政协副主席的李志宏先生时有研究李映庚的成果寄我，使我受益匪浅。沈阳音乐学院一位教授曾写信给我，他是位潜心研究李映庚的学者，和我索要李映庚的相关史料，我热情地向他推荐了李志宏先生。

据李志宏、周龙斌、周俊超所著《清末艺坛二杰》一书介绍，李映庚（1845—1916）字嘯溪，出生在海州板浦一个小康人家，幼年读书，聪颖过人，而立之年便考中举人。李映庚自幼对音律特别喜爱，虽考中功名，但对音乐的爱好的痴心不改，在家中开设票房，演唱昆曲以自娱。年深月久，他演唱昆曲已近炉火纯青的境界，对音律的研究也颇有见地，这对他以后创作《军乐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4岁那年李映庚考中进士，后分配至直隶省迁安县任知县。他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三年后擢升知府，先后在正定、大名、天津、保定等府任职，民国初年升任民国政府的肃



李映庚

政史。他任天津知府时恰逢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后袁又接任直隶总督,二人颇有交往。袁世凯欲复辟称帝,李映庚表示了激烈地反对,愤而辞官回乡。待袁去世后,继任总统黎元洪欲聘李映庚进京出任新职,但李映庚已于1916年11月去世,终年71岁。

李映庚创作《军乐稿》从他在天津知府任上开始。当时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仿效外国陆军建制,创建一支军乐队。袁深知李映庚精通音律,便请他编创乐谱,并主持“军乐传习所”,亲授军乐。从《军乐稿》中李映庚的自序以及书中收录他给袁世凯的两封上书中,可知他创作的过程、全书内容以及创作思想。《“军乐稿”叙》中记载:“映庚以乙巳正月奉檄修军乐,阅三月,声律粗有发明,出《军歌》十余阙,付工肄习。”这段文字清楚地记述了李映庚于1905年农历正月奉命创作军乐,历经三个月,完成了十多首新颖的军歌,交付乐队练习。在《上袁尚书第一禀》中,向袁世凯介绍了他创作的过程,先完成军歌歌词的创作,按内容和用途分为十五个类别,将歌词呈送袁世凯审定。歌词创作的原则是:“关乎国典例者,其词不得不雅;关乎军礼者,其词不得不庄;为将领所歌、中学堂以上

所采用者,其词不得不文;为士兵所歌、中学堂以下所采用者,其词不得不质。”在《上袁尚书第二禀性》中,以问答的形式,阐述了他对军乐创作及其音律特征的见解,是一篇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显示李映庚很高的音乐修养。《军乐稿》全书共四卷,卷一为表;卷二为配上工尺谱的军歌,计有《神武颂》、《升旗颂》、《望阙吟》、《军祷歌》等七种20首;卷三为军中散乐,配词乐谱,计有《男儿汉歌》、《宝刀歌》、《铁血歌》、《得胜歌》等十种43首;卷四为军中的礼乐,全部乐谱,有《步法》、《迎送》、《行礼》等五首。

李映庚创作《军乐稿》,开创了我国现代军乐的先河。他在传统昆曲曲牌和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在旋律上简化,节奏上强化,再配上气势恢宏的西洋铜管乐队伴奏,使历来轻歌曼舞、一唱三叹的昆曲,而衍变为铿锵有力、威武雄壮的新乐,首创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军乐作品,这是个了不起的创举!《军乐稿》的歌词为李映庚新创,如《男儿汉歌》中:“男儿汉,生大邦,全球无此好封疆,须将万里人民看作同胞养,都要轻身命,重天良,莫将咱,国名丧。”《行军歌》中:“上了平川路,儿郎莫念家,家中告了爹娘假。营中支起英雄架,手中提着钢刀把,说甚艰难苦话。提起精神,挣得个军人身价!”歌词通俗易懂,无处不体现了作者爱国主义的激烈情怀。《军乐稿》的价值也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肯定,已故音乐史家沈知白先生在《中国音乐史纲要》中肯定了这部著作具有的人民性,并希望“这份乐谱我们应该翻译并加以整理。”原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会长武俊达先生著文写道:“《军乐稿》对中国军乐发展史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这对如何吸收祖国取之不尽的优秀传统音乐遗产,为当代民族化的新军乐,以至民族风格的声乐曲和器乐曲的创作……都是大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毋庸置疑,李映庚是我国现代军乐的创始人,《军乐稿》在我国军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作者单位:市艺术研究所)

责任编辑 邱仕明

# 徐积

## 和他的《东海大松歌》

伏广喜

### 云台自古多古松

“天下之松莫奇于黄山，人所共知也。吾则谓莫奇于云台之松。奇矣，而最奇者凡十有一……”这是清人谢元淮在他的《云台十一松记》上开头写的一段话。是的，云台山自古就以多古松见称。早在唐代，日本和尚圆仁来中国求法，在他的日记中就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云台山松景：“高山重岩，临海险峻，松树丽美，甚可爱怜。”明唐伯元的《游青峰顶记》石刻上有“顶上多巨石，产万年松，经霜愈秀”的记述。明顾乾的《云台山志》上刊载的《云台二十四景》中，设有“松溪听月”一景，并附描述曰：“松柏满山，……每遇风清月朗，松涛古籁，听之有绝尘之想。”清道光年间编印的《云台新志》一书，专门辟有《灵植》卷，专题介绍云台山古松。云台古松最奇、最美、最有名望的在哪里？在青峰顶（今花果山）三元宫附近。那就是前面提到的谢元淮《云台十一松记》中描述的云台十一松。它不仅记下了这



徐积画像

些古松所处位置、概貌特征，多数还附有名称，如龙松、卧松、扇面松、藤松、拐杖松等。排在十一松之首的则是三元宫西涧的龙松，又称蟠龙松、蟠龙丈人、东海大松等。《云台十一松记》称它“独钟云台之灵，为万松祖，夭矫盘互，气象万千。”自宋代以来，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赞美这棵古松的诗作。其中以《蟠龙丈人歌》为题的就有陶澍、张井、陈文述、齐彦槐、谢元淮、许乔林。其中谢元淮还写有《重游蟠龙丈人诗》，许乔林还写有《蟠龙松歌》。最早赋诗描写东海大松的是宋代文人徐积。其诗题为《东海大松歌》。这首48句的七古长诗，为东海大松唱出了一曲动听的赞美之歌。后人陶澍等人的《蟠龙丈人歌》均受其影响而作。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几本地方志书均收录了这首诗。这首诗的作者徐积何许人也？现存的连云港几部地方古志书均未做介绍。就是现代编印的一些描述古今连云港的诗集，记述徐积的也只是寥寥数语。近阅明正德、天启，清乾隆、光绪几个版

本的《淮安府志》及《二十五史》之《宋史》，见上面均载徐积事。于是笔者便对照阅读，互补有无，一份较完整的徐积生平事迹资料便呈现于眼前。

### 徐积的坎坷一生

徐积，字仲车，自号南郭翁。生北宋天圣6年(1028年)，卒崇宁2年(1103年)。世居山阳(今淮安)。曾祖崇、祖父爽都没做过官。父石，曾知融州罗城县(今属广西)事。3岁那年，父病故。母亲只好带他投奔陕西外祖父家，直至15岁才返淮安。

徐积是个孝子，父丧那年，虽只有3岁，却也悲痛欲绝。母亲要他读《孝经》，他痛哭不止，不能成诵。因父名石，便终生不用石器。行路时遇到石，总是绕而行之。对母亲则更孝。如入都应试那年，不忍让母亲一人独守孤家，便推起独轮小车，载着母亲徒步西行。母亡时，竟7天未能进食，悲恸吐血。然后，睡草苫，枕土块，守墓3年。翰林学士、时楚州知州吕溱知道后，不无感慨地说：“假如鬼神有知，也会为之垂泪。”徐积20岁那年，拜吴中著名学者胡瑗为师，研习经艺，长进神速。由于少年饱受磨难，成年时徐积就患有耳疾，以致年近不惑时(治平4年，即1067年)才中许安国榜，敕同进士出身。然而，却因耳疾，未能赴任。这样，在家一待就是19年，未入仕途。元佑初(1086-1089年之间)，方由哲宗皇帝身边的大臣力荐，授以扬州司户参军衔，具体为楚州教授(掌管州学课试等事，位居提督学事司之下)，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由朝廷聘任的首例聋人教官。在这岗位，一干就是10年。绍圣3年(1096年)，已68岁的徐积转任和州(今安徽巢湖一带)防御推官，具体为掌勘问刑狱。两年后，又转授宣德郎。崇宁2年(1103年)，又在西京(今西安)嵩山任职，重抄教鞭。几个月后的农历五月初一，因病逝于中岳庙馆舍，享年76岁。在他逝世13年后，朝廷赐予“节孝处士”称号。

徐积博学多才，诸子百家无所不精。农学方面，最擅长的是治河，著有《治河说》，在治学上，以六经为主，精攻注疏训诂，对后世训诂学的发

展启迪良多。最有成就的当然还是诗文创作。著有《节孝集》20卷，现存《节孝先生文集》30卷，附《语录》1卷，《事实》1卷。

### 《东海大松歌》，一曲壮美的赞歌

据宋史载，徐积“自少及老，日作一诗”，从不间断。今存的《徐节孝集》30卷中，诗词即占27卷。可见徐积诗词创作数量之多。《东海大松歌》是诗词卷中的一首。它是一首七古长诗，今人评价为：“体制恢弘，气势磅礴。”诗人饱含激情，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东海大松之英姿和神韵。我们可将该诗分三层欣赏。

第一层，以夸张的手法写出了大松的壮美形态：

东海有物天下雄，万灵戮力生奇松。  
天精地粹萃其下，沧溟百道来相通。  
一根直去穿九泉，一根斜插鲸鱼渊。  
远者压折巨鳌背，近者倒缠山根偏。

大意为：东海有一棵天下称奇的古松，它是合万物之灵气而生。天精地粹汇聚其中，宇宙万物与之相通。它扎根九泉，远伸大海深渊。远望，可压断巨鳌之背；近观，盘根错节，盘缠着高高的山崖。

接着写道：

小枝可就千钧弩，大者可挂万斛钟。  
唯有老干苦难状，吕光营外堆九龙。  
身披北帝雄犀甲，虎贲联臂围不匝。  
无计都将大地遮，有心尽把浮云刷。  
樛枝入地旋复上，怪怪奇奇非一状。



蟠龙松图

大意为：那些纵横交错的小枝可造千钧之弩，而主枝可垂挂万斛之钟。那历经风雨的老干，就像身披犀甲的勇士，好几个壮汉拉起手来都不能将其围拢。巨伞般的树冠遮护着大地，驱赶着浮云。整个大树弯弯曲曲，奇奇怪怪，矫若游龙，蔚为壮观。

第二层，以丰富的想象，用拟人化手法，写大松既不畏风雨，又包容万物。

先写大松坚毅的一面：

谷陵相变任古今，土木两行专王相。  
列帜空遗渭川垒，犒师留得杨隋帐。  
玄驹来撼亭亭盖，绿鱼飞入沧浪漾。  
最是半宵风雨声，山妖走尽川魅惊。  
十万争挥铁槊骑，百千齐斗黑骑兵。

大意为：任由谷陵相迁，日月轮回，土能生木的规律永远不会变。不论是列帜的营垒，还是犒师的军帐，均不如大松威武、壮观。而那不自量力的玄驹（即蚍蜉）又怎能撼动大松伟岸、挺拔之势呢？在茫茫林海间，大松就像一条绿色的飞鱼，在沧浪间驰骋、遨游，激起一层层涟漪。半夜里风雨交加，山妖鬼魅，惊恐万状，疯狂逃奔，大松却似整装待发的千军万马，凛然不动。

再写大松浪漫、宽容的一面：

有时海面波涛小，一部仙韶下蓬岛。  
残声逐水散鸣琴，遗响穿云聚啼鸟。  
混沌以来凡几朝，清气浊气浑未消。  
独叶笋来新盖风，双柯合处旧藏蛟。  
其木既异其事殊，德若有容材有余。  
大鹏斥鷃皆可居，相忘有似江湖鱼。

大意为：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大松会奏出像仙乐一样优美的琴音，穿云破雾，从蓬瀛仙岛的水面上缓缓传出，引得百鸟齐唱。开天辟地以来，已过去多少个朝代，清风浊气仍在交融中，而大松始终枝壮叶茂，既能栖凤又能藏蛟。这株大松有容物之德，大到大鹏，小到斥鷃，皆可在它顶上栖息。而且不分尊鄙，相处得如江湖之鱼。

第三层，以浪漫之笔，写大松以自己的大德大智，既赢得世人的拥戴，又得到上帝的庇护：

美哉此木真不凡，能以智免斧斤间。  
过尽工师无所用，庄周应作不材看。  
大松大松如此奇，方與圓盖不可知。

阴阳山海气合离，不然神物相护持。

大意为：东海大松，你美而不凡。你是以自己的智慧保护着自己，上千年来，万千工匠从你跟前走过，却不去砍伐你，正如庄周所说，在材与不材之间，你能够生存下来，天地之间谁也解释不了，实在是太奇了！只能说，你的大德大智，是合阴阳山海之气而生，似乎有神在护卫着你。

### 东海大松存至何年

从清两江总督陶澍的《蟠龙丈人歌》序中我们得知：东海大松高约2米，树围近4米，平顶，伸出两条主枝，一南一北，犹如两条巨龙，甚为壮观。其松到底已生存了多少年？据《江南通志》载，在徐积写这首诗时，此松已是“三代以上物”。而至陶澍巡视这棵树的道光12年（1832年）又是700多个年头。在这之后至光绪末年，正是云台山香火最旺盛的时期，每天到这里进香者络绎不绝。更有甚者，有人竟将香火放在大松树洞里面焚烧，大松岂能不亡？光绪5年（1899年），这株寿高逾千年的古松终于被宝应一位虔诚的香客香火所毁。据彭云先生《海州乡谭》一书载，大松焚毁前，沭阳一位自称建陵老人的名士，曾撰写一篇题为《募修龙松墙垣启》的文告，建议在大松四围砌一圈围墙，使焚烧者与大树隔开一段距离，以保护大树免遭火烤。他的这条建议不但没有人采纳，还被一些人讥为“书生化缘”。十一松中其他九松，在1934年出版的《连云一瞥》中，也被宣告“痛惜已萎”。最后一株，也就是今人最熟悉的美人松，存至1979年。《云台十一松记》中记载说：“东竹园西北，有松一株。凡松皆孤干独秀，而此则双枝连上，自根至巅，齐荣并翠，为交让，为连理，为人增同气之感。”美人松也是死于人为因素。据说，当时是为了增强避雷针导电功能，有人用50多公斤食盐埋在美人松下。由于离松根太近，盐分被根须所吸收，导致美人松渐渐枯萎，直至死亡。如今在东竹园西北，我们只能看到一根光秃秃的枯干和一根被折断的分枝干，早已没了当年巨冠盖顶，树叶披离，黛色参天的迷人仙姿。

（作者通讯地址：开发区朝阳镇西庄村6-18）

责任编辑 邱仕明

# 从大浦地名说起

蔡立志

自2010年以来,我与毛太鑫先生合作撰写《崛起——追寻连云港城市发展的足迹》一书。在此过程中,对连云港市区的一些地名进行了探索,其中印象深刻的有大浦和东盐河两处地名。

## 一、先说大浦

浦,据《辞源》解释,乃“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方”,“水源枝注江海边曰浦”。据此定义,大浦称浦很合浦意。历史上,板浦、新浦均曾因地处海边的河流入海口,而称为浦。板浦,因唐代官河(今称盐河)开挖以前,滩地中间有一条南北向流淌的入海小河,灶民为了便利交通,在小河上架桥,在低洼处以“苍梧板铺垫,以利通行”,因而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板铺”;又因为“铺”、“浦”音形相近,称此地为板浦顺理成章。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从苏北入海,带来大量泥沙,特别是明弘治八年(1495年)黄河从黄陵冈决堤分流夺淮以后,引起海岸线迅速外延,板浦逐渐离海远去;海口转移到卞家浦后,于清嘉庆三年(1798年)到达孔望山北,此时的海口因盐河上游原有板浦、卞家浦,此处海口便称新浦口。在清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新浦河口移到沈圩桥一带,与龙尾河交汇注入蔷薇河临洪口,此时的蔷薇河临洪口称为后潮河。由于盐业发展,新浦西跳外成了盐业集坨之地,许大圩所在的后河底成了渔业码头,洋桥巷一带的前河底成了盐运码头。

在此形势下,新浦口一带人口增加,集市繁荣,清光绪18年(1892年)垣商刘殿振兄弟为首筹建天后宫,因此如《天后宫记》所言:“新浦之兴,自天后宫始”,新浦成为新的集镇,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于此设立新浦镇;从此有了新浦行政地名。

上述文字讲述了板浦、新浦地名由来的缘

由,那么大浦的地名又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呢?翻遍手头资料,无有结果。拿出隆庆六年(1572年)刊刻付印的《隆庆海州志》,其《山川·诸水》中这样记载道:“大义浦,去东海城(指南城)北……西通海潮,便于运盐。”顿时眼前一亮,难道今日的大浦,是由此大义浦演变而来吗?带着这样一个猜想,我们又进行了探索。《隆庆海州志》中说:“大义浦,去东海城北,”这不错,不论是原位于原大义村的大义浦,还是现在的大浦,均位于南城以北,方向应该说不错。接下来说:“西通海潮,便于运盐。”这话应这样看:1572年,云台山和锦屏山之间还是一道浩瀚的海峡,名为第一道鹰游门,至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才成陆,因此说“西通海潮”、“便于运盐”一说,也是因为当时云台山周围滩涂,包括大村(原称大义村)在内的滩涂均属徐渎盐场,云台山为海岛,大义浦一带所产海盐自然要通过大义浦河运出,“便于运盐”这是历史事实。随着清康熙五十年第一道鹰游门成陆,但大义浦的水却永不枯竭,有水就要有出路,便随着陆域的延伸,不断向海水退却的地方流去,于是在现在大浦这个地方形成大义浦。像新浦口由孔望山北一直退到后潮河边一样,大义浦这个名称也就退到了现大浦这个位置。那么大义浦又为何称为大浦的呢?这恐怕与地方语言习惯有关系。什么关系呢?这样说吧,当初大村原名大义村,后来转称大村,既然大义村能转称为大村,大义浦又为何不能转称为大浦呢?大浦的地名可能就是这样来的。大浦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始有居民在此以晒盐为生,由于水运交通之便,清光绪初年(1875年)被已获初步开发的新浦有识之士看好,在此进行港口作业,光绪帝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1905年9月22日)批准大浦口自行开放,

从而确定了大浦地名称谓。

随之大浦港因盐运、渔业的海陆、海河联运条件，促使其迅速兴起发展，更加之民国15年(1926年)陇海铁路修到大浦，使大浦港成为海属地区及陇海铁路的出海口，民国21年(1932年)，大浦人口除4千流动人口外，固定居民达4千多户、1万3千多人，街上有名菜馆20多家，商行18家，旅社9家，妓院20多家。大浦港自光绪末年开放，到民国22年陇海铁路延伸到连云港；这30多年兴旺后，因民国19年(1930年)板浦盐场由大浦迁到猴嘴，盐圩也从大浦迁到猴嘴，加之大浦港因淤塞而功能丧失，从此大浦港风光不再，到解放后成为仅有几十户居民的街道居委会。

## 二、再说东盐河

连云港市的人都知道新浦公园西侧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盐河，为原以盐运为主的漕运官河，因位居新浦市区西侧，人们称其为西盐河。有西盐河，是否有东盐河呢？有。打开地图一看，又很纳闷。原因是东盐河只有从东玉带河向北至宋跳短短几公里长。既然叫盐河，肯定是为了盐运而掘，这几公里长的东盐河，在1956年前没挖东玉带河、1958年没挖排淡河之前，东盐河走向如何呢？盐运何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翻阅了所有地方志书，均无东盐河的交待。我又翻出了2010年《江苏影像地图册》，上面标着东盐河从东玉带河至盐坨火车站。这样一来，重又给了我一个启示，即东盐河确实是盐运的产物，或是将盐运到盐坨供火车待运，或是将盐坨的盐斤运往外地。到此，问题又来了，东盐河到东玉带河止，在东玉带河还没开挖之前，它能走向何处呢？找出《连云港市水利志》219页东盐河条款，这样写道：“东盐河原名小盐河，由板浦西的杨窑村至猴嘴。”见到这段文字，我忽然想起30年前的一件事：1980年我任锦屏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有一天在市农业局开会，市政府分管农业副市长徐河均将我叫到新浦农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绍盛处，对我们两人说：“你们把新浦农场和锦屏公社许庄大队之间红沙路一带的土地权属问题处理一下，把处理结果向我报告。”带着这个任务，我走访了家住小海生产队、在锦屏兽医站任站长的王永来同志。他带我来到南

城谢禄山西北山脚处，指着他承包养鱼的200多米废河床说：“这就是原来的老盐河，直通火葬厂以北，红沙路以南，这老盐河以西的土地都是我们许庄大队的。”我将这调查结果报告了徐副市长，以后怎么确定地域界限的事，我就没有再过问。现在想想，王永来所说的老盐河应该就是当年的小盐河了。

小盐河的走向应该说是基本解决了。但小盐河是何时挖掘的呢？我又查阅了《江苏盐业志》。1926年陇海铁路出海口修到大浦，这时位于宁海乡太平埝一带的板浦盐场已远离大海，随着大浦的兴旺，导致场署迁到大浦。随着大浦港的淤塞，陇海铁路又向连云港修去。1932年新浦以东铁路修筑，板浦盐场打算建立新的坨地。这时陇海铁路局为了揽货的需要，将用1元银圆一亩购买南城武吉门家的盐碱地无偿的赠送600亩给板浦盐场修筑盐坨，陇海铁路也就在盐坨处设立了一个盐坨火车站。1933年孙家山临时码头启用，迎来了连云港开港以来的第一艘千吨货轮“光华号”，新浦以东的陇海铁路正式运营。板浦盐场场署也于1933年由大浦迁移到猴嘴。

小盐河何时开挖的呢？《江苏盐业志》上有这样一段叙述：“最初(1926年前后)，大浦坨是私营官管，到1933年政府为了垄断盐业运输，即以自己雄厚的实力，挤跨私人坨地。”有鉴于此，从盐坨至板浦西场窑的小盐河应为1933年开挖，开挖后的小盐河因老盐河称之为西盐河，小盐河在新浦东，人们便称之为东盐河。这大概就是东盐河名称的由来吧！

东盐河从猴嘴盐坨至板浦19.3公里，现在又为什么只剩下不足10公里了呢？这在《连云港市水利志》中有所交待：“1958年，开挖了西玉带河至沈家桥段，称为东玉带河，”东玉带河与东盐河相接，也就截断了东玉带河向南部分；被截断的玉带河以南的小盐河也就逐渐废弃了。“1967年春实施东盐河与排淡河连通工程，因此，东盐河自宋跳向北部分也就淡出了。因此，东盐河便剩下了玉带河至宋跳一段，人们仍称之为东盐河。”

(作者单位：市委农工办)  
责任编辑 邱仕明

# 英勇顽强铸丰碑

——纪念朱慕萍诞辰 100 周年

关仁

1948年，在解放连云港的战斗中，有一支英雄的部队，他们从板浦打到南城，从新浦打到连云港海边。

1949年春，这支部队奉命南下，参加西梁山战斗，打响了渡江战役第一枪。是役，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献出了年轻的 37 岁生命。

这支部队的名字：灌云县独立团——三野 30 军 90 师 270 团。团长：朱慕萍。

谨以此文，献给朱慕萍团长诞辰 100 周年。



朱慕萍

朱慕萍，1912年4月19日出生，江苏涟水人。1932年3月在响水口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在上海转为中共党员。1938年1月，参与组织涟水县抗日同盟会。1939年6月，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成立，先后任八团三营营长、八路军教导第五旅参谋、涟水县游击大队长。1942年5月，任八路军涟水独立团副团长。1945年12月，调任灌云县独立团团团长，率部拿下东辛据点，开辟了东辛解放区。1948年4月任灌云县独立团团团长兼县长。在解放连云港的战斗中，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指挥独立团和部分区中队，歼敌大半个旅。不久，独立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270 团，任团长。1949年3月，奉命率部参加渡江战役。攻占西梁山的战斗打响后，不幸壮烈牺牲，时年 37 岁。

## 历尽艰辛寻找党

1912年4月19日，朱慕萍出生于江苏涟水一个农民家庭。1932年3月在响水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学校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只身赴扬州，秘密找党。得知线索后，于同年冬到上海。1933年1月，朱慕萍在上海找到地下党组织，被编入沪东区共青团街道支部，先后任团小组长、支部书记，在青年和失业工人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33年3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虽遭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不但丝毫未吐露情况，还冒着危险，规劝鼓励被关押在一起的其他已经招供的人翻供，结果争取了五六个人恢复了自由。出狱后，经组织考查，恢复了组织关系，并于 1933 年 7 月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沪东区委宣传部干事、秘书等职。1934年1月，朱慕萍在上海再次被捕入狱，按嫌疑犯判一年三个月的徒刑，解往苏州反省院执行。关押期满出狱后，他再次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找了两个多月没有结果。后返回家乡办小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朱慕萍积极参与组织涟水抗日同盟会等救亡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当局不仅不支持，反而百般刁难，加以破坏。斗争极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苏北的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时期遭到了完全破坏。涟水的陈书同、李干成及邻县与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党员纷纷到外地找党，都因为形势发展急速，党组织派不出人来。苏北的抗日需要党，广大民众盼望



组图《找党》

党。朱慕萍开始了自己第三次找党的行程,这一次,他按照李干成提供的线索,与陆亚东结伴而行,于1938年10月离家北上。

朱慕萍和陆亚东几经周折,在邳县铁佛寺镇找到了中共苏皖特委。听取汇报后,特委领导向他俩解释,当下急缺干部,一时派不出人到淮(阴)、涟(水)。朱慕萍向组织详细地报告了自己此前曾到上海找党,历时两个月靠要饭度日而未果的经历,诉说了几年来思念组织的心情,表示这次一定要把党带回家乡的决心。两个倔强的涟水青年硬是和特委“磨”了两个多月。1939年1月,特委决定由原组织部长张芳九带领高兴泰和戴曦,随朱、陆二人到淮、涟地区开展工作。肩负着领导淮属地区民众抗日的重任,张芳九等三名党的干部化装成老百姓,随朱慕萍和陆亚东日夜兼程向涟水行进。途中,不仅要顶风冒雪、抗击严寒,更要小心翼翼地绕过日军的据点、穿过顽军石友山部的防区。

1939年2月10日(农历腊月二十二),张芳九一行五人到达涟水县同兴乡(现前进乡)朱后圩村朱慕萍家。这年春节,张芳九等人就是在朱慕萍家过的。由此,朱后圩村成为抗日战争初期党的火炬重回淮属地区的第一站,朱家成为我党领导当地抗日武装斗争的可靠联络点。不久,村里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很快又发展为党支部。

淮安地区的老党员迅速地重聚在党的旗帜下,淮安地区的抗日民众从此有了主心骨。张芳九等同志到达淮、涟后,立即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起淮属临时工委(后改为淮属中心县委),组织和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党的领导下,朱慕萍先在家乡朱后圩组织游击队,后又同隆兴寺、朱南荡、小成集等几支游击队汇集,组成独立营抗日义勇队。1939年6月,八路

军陇海南进支队八团成立。朱慕萍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经常带领部队打击敌人。1940年2月中旬,部队在马庙进行休整时,遭到顽敌突然袭击,在这险要关头,他奉命组织一支突击队,冒着生命危险,杀开缺口,趁夜掩护部队突围,胜利完成任务。

皖南事变后,朱慕萍奉命率600多人的队伍充实八路军教导五旅,任少校参谋。不久,又被调回涟水任游击大队长。他率队一直守卫在边区,使顽军无一宁日。1941年经中共淮海区委组织部批准,朱慕萍重新加入共产党。1942年5月起任八路军涟水独立团副团长,为打破敌伪封锁,维护淮海、盐阜间的交通线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同年冬调任涟水县麻垛区区长兼大队长,领导麻垛区人民开展反“伪化”、反“蚕食”斗争。斗争刚取得初步胜利,又被调到斗争更艰苦更残酷的盐西区任区长兼区大队长。他通过镇压坐探,严惩奸细,抓武装斗争、政权建设、改造地形,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配合主力攻克盆庙据点等一系列措施,同敌人作针锋相对的苦斗,打开了盐西区的局面。1945年2月,朱慕萍调任淮阴县警卫团团长,领导了清除淮沭等沿线敌人据点和收复清江城的战斗。

2011年“七一”前,卜连明、张伯镇等人,以朱慕萍早年革命经历为素材,完成了一组名为《找党》的连环画。这组连环画被“老崔”发布在“Laocui 新浪博客”上,已吸引40000余人次阅读。网友“拙人”在看完组画《找党》后,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感受:“找党,找的是信念。找党,就是坚持理想,坚持信念,坚信中国革命必胜。找党,找的是责任。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终身,是党员的神圣职责。找党,找的是奉献。找党,找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 率部解放连云港

1945年12月,朱慕萍调任灌云县独立团团长。率部拿下东辛据点,开辟了东辛解放区。1946年9月,独立团改编为淮海第1支队,朱慕萍任1支队参谋长。在解放军主力北撤后的险恶环境中,朱慕萍率领部队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亲自指挥小伊山、马车沟、陡沟、大伊山等歼灭战,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周法乾、徐继泰、蒲开喜等几股顽匪,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1948年4月,朱慕萍调回灌云县,任灌云县独立团团团长兼县长。

1948年11月6日,战略大决战之淮海战役正式打响,苏北军区第六军分区部队火速挥师北上,策应淮海战役。当日,朱慕萍率领灌云独立团占领灌云县城板浦,并继续侦察新浦、海州敌情。7日上午,云台山大战打响,朱慕萍亲率独立团二营出战。据现90高龄、时任独立团二营营长的徐士善老人介绍,进攻从南城开始,整个战斗分三个波次:第一波次,通过开阔地。战士们三五人一组,以小群动作运动。跑到三分之二,敌人才发现。枪炮打来,部队已到山脚下,这里是敌军炮火的死角,敌人干着急没办法;第二波次,发起进攻。原来准备休息一下,然后向山上进攻。但是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军分区的山炮响了,各连都吹响冲锋号,全营指战员一片杀声向山上冲去,敌人吓得连忙拖着枪炮逃命;第三波次,是乘胜追击。因为是山地,把敌人全部压在山坳子里。部队刚攻上山头,团指挥所就跟上来了,朱慕萍团长、邢政委到达山头。接着,朱团长对敌逼降。十几分钟后,国民党军打起了白旗投降。

苏北第六军分区部队直取海州、新浦及盐场地区各乡镇。拿下新浦后,几个月没理发,满脸络腮胡子的朱慕萍利用空隙,在新浦理了发,照了张照片。这张照片,成了朱慕萍团长最后的照片。

当晚,朱慕萍率部队进抵墟沟以南的马山、汪店、平山一带,直逼连云港。在北面,鲁中南第六军分区部队向新浦、海州进发,继而向连云港追击。8日中午,苏北第六军分区第1团和灌云独立团占领了墟沟、孙家山,与北路鲁中南第六

军分区第1团、第2团及东海独立团会合,共同追歼向连云港逃窜的敌人。同日,鲁中南第六军分区政委谷牧带领军分区机关进驻新浦、海州。9日,南北两路部队合击连云港逃敌。11日,连云港全境解放。

连云港的解放,切断了徐淮地区敌人的海上退路,打通了我军在山东、江苏之间的通道。

### 挥师决战西梁山

1949年初,灌云独立团改编为第3野战军90师270团,朱慕萍任团长。1949年3月下旬,270团接到命令,向安徽和县西梁山进发,准备横渡长江。3月底,270团抵达西梁山北边的白渡桥,就地待命。

西梁山位于长江西岸,与隔江相望的当涂县东梁山合称为“天门山”,地势险要,李白曾有“天门中断楚江开”的诗句传世。这里自古是兵家必争重地,国民党海军在芜湖以下长江航道中的主要屏障。主峰前为大团山,山下是一片开阔地,敌人在长江北岸7个桥头堡中重要的一个设于此。并且,这段江面也是千里江防中较窄的一段,江中还有三个沙洲,可以作为渡江的跳板。

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格外重视西梁山防务。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和守军66军军长亲登西梁山,部署陆海空火力,下令死保西梁山。西梁山前满布地雷和铁丝网,构筑了许多碉堡,山底挖有深沟陡壁,插上有毒的竹签,栽设树篱。山上则修筑三道壕沟,筑有坚固工事及机枪阵地。江心的陈桥洲有一个炮群,东梁山上还有一个炮兵阵地。另有4艘军舰在长江游弋,配合作战。此外还有数架飞机随时支援。这一态势意味着西梁山是敌方势在必守而我方又势在必争的重地,一场争夺的恶战在所难免。

4月7日上午,30军90师党委研究了进攻西梁山的战斗部署,决定由269团担任主攻,268团担任佯攻,270团作为师的总预备队准备攻打西梁山。是日黄昏,各团从驻地出发,进入阵地。随着指挥部一声令下,战斗打响。由于敌人占据有力地形,而且海陆空同时开火,两天激战,我269团伤亡惨重,



朱慕萍县长在板浦各界庆祝徐州解放大会上演讲

只剩下预备队两个连。师部决定调 270 团三营接替任务。朱慕萍一接到电话,立即和政委、参谋长赶到师部,接受师长命令“24 小时内拿下西梁山主阵地”的任务。

从师部回来后,270 团迅速制定了作战方案,一营从左侧担任佯攻,二营作为团预备队。为了完成“24 小时内拿下西梁山主阵地”的任务,朱慕萍主动向师部请示要求亲临阵地指挥战斗,师领导终于被他的诚意打动。放下电话,朱慕萍迅即带上警卫员直奔前线。当主攻营刚进入阵地时,他也正好赶到。团长的突然到来,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一个个摩拳擦掌,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坚决拿下西梁山”。

由团参谋长孙万景带队的主攻营三营很快拿下小山头,但向大山头进攻时,遭到了顽强抵抗,伤亡惨重。部队重新组织期间,敌人用两个营的兵力开始反扑,主峰上几百名敌军蜂拥着冲向我军占领不久的阵地。西梁山与陈桥洲的炮火更密集地向山头倾泻,长江里四艘敌舰又发动了炮击,10 余架次的敌机还轮番地向我军阵地狂轰滥炸。三营将士前仆后继,与冲上来的敌人作殊死的拼夺,一个战士倒下了,另一个战士马上跟上,机枪射手倒下,副射手立即端起机枪。战士们对伤痛生死全然不顾,竭尽全力,与敌人厮杀。就这样硬把敌人压制下去。

4 月 10 日晚 10 点,是 90 师准备总攻西梁山主峰的时间。除 270 团外,军部炮兵营和一个山炮营,一共 20 门大炮也进入了阵地。

当天下午 4 点左右,朱慕萍来到小陀山阵地战壕内。警卫员提醒他:“团长,离总攻还有几个小时,你先休息下。”朱慕萍说行,就在战壕里休息吧。“这不行,还是到地堡里比较安全。”警卫员劝道。就在这时,敌人开始炮击了。“砰!”敌人的一发炮弹飞过来。通讯班长被炸飞,随后又有几名战士被炸倒。眼睁睁看着许多战士牺牲,朱慕萍在战壕里急速地来回踱着步,思考着下一步策略。这时,又一发炮弹飞来,正好落在朱慕萍面前。随着一声巨响,朱慕萍慢慢倒下。无情的炮弹壳穿过他的左肋骨,直插入他的内脏。朱慕萍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 37 岁。

其实,他本可以不去战场指挥,他是向领导“吵”着要去的。这一去,把牺牲留给了自己,平安给了别人。西梁山战役,30 军 1500 多名官兵阵亡,其中,270 团有 100 多人。

当晚,90 师并没有向西梁山发起总攻。因为



2011年7月,朱慕萍烈士之子朱会民来连参观市革命纪念馆

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国共双方达成临时协议,停战 8 天进行和谈。270 团再次撤回白渡桥驻地待命。

4 月 20 日晚,渡江战役正式打响,270 团被部署在长江边,牵制敌舰,掩护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西梁山战役,打响了渡江战役的第一枪。朱慕萍团长是此次战役中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员。

1949 年冬,淮阴党、政、军组织联合决定,派专人到安徽和县将朱慕萍遗体运回,安葬在城南公园内(现淮安市清晏园)。

1950 年 10 月 30 日,中共华东军区党委决定恢复朱慕萍 1932 年 3 月至 1933 年 7 月的团龄和 1933 年 7 月至 1943 年的党龄。

1952 年 12 月,安徽县人民政府在西梁山修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烈士塔和纪念亭。1988 年 12 月,建立了朱慕萍烈士牺牲地纪念碑。2008 年新建的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设有朱慕萍烈士事迹展位。

1958 年 4 月,清江市人民委员会(现淮安市)为朱慕萍修墓并立新碑。

1980 年代,安徽省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设立了朱慕萍烈士事迹展位和遗物展柜。

2009 年,朱慕萍被评选为“5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江苏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2011 年 7 月,新落成的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设有朱慕萍烈士事迹展位。

2012 年 3 月,灌云县烈士陵园设立了朱慕萍烈士事迹展位。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工办)

# 连云港 早期 党组织 领导人

◆刘成文

连云港地区最早的党组织建立于1927年。1928年5月,被江苏省委巡视员解散。当年夏天,李超时同志奉命来连云港地区(当时称东海县)重建党组织,并发展成为东海中心县委。1929年6月,国民党政府对连云港地区的共产党员进行疯狂大逮捕。为避免更多的革命损失,许多党的领导人奉命撤离。连云港地区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期间,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时代风云人物,他们中有的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有的在革命洪流中经受不住考验,成为可耻的叛徒,有的由于自身能力水平的限制,昙花一现,只成为历史天空中短暂的流星。

据有关资料,最早来连云港地区进行共产党组织活动的是吴苓生。吴苓生,又名吴丽实。1899年出生于沭阳县颜集乡,1919年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3年2月,他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暑假,由组织介绍去苏联求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从苏联回国后,他立即参加了国内的革命斗争。1924年10月,党中央派他到哈尔滨开展党的工作。途经淮安市,专程到海州进行党的活动。他以看望同学为名,向当时的省十一中学(现海州高级中学)部分师生宣传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主张。不久,他就离开海州前往东北。他先后任哈尔滨特支委

书记,北满地委书记,东北三省特派员、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以后又调任山东省委书记。1930年2月,因叛徒出卖,被捕。1931年4月5日,在济南被国民党杀害。

1926年4月,国民党东海县党部派顾浚泉、陈秀夫等人去武汉“江苏省党务学习班”学习。在此期间,顾、陈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他们回海州后,在海州城内二营巷杨家的一间楼上,成立了共产党东海支部。顾浚泉担任书记,陈秀夫任组织委员。不久,顾浚泉、陈秀夫被江苏省委巡视员罗世藩以“热衷国共合作,建党怠惰”为理由开除了党籍。

顾浚泉,又名顾恩渊,海州人。被开除党籍后黯然离开海州。江苏省委随后发现巡视员罗世藩工作过于偏激,一下子就错误地解散了几个地区的党组织,于是决定予以纠正。1929年2月,省委恢复了顾浚泉党籍,并安排他担任江苏省委交通站的负责人。顾浚泉后来赴四川从事党的工作,壮烈牺牲。对于他的最后结局,连云港至今仍然存在一些误解。

陈秀夫,又名陈世成,海州人。被省委巡视员罗世藩开除党籍后,坚持在海州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6月被国民党逮捕,不久被保释出狱,后下落不明。

1928年7月,江苏省委派李超时、叶子均两位同志来海州开展重建党组织工作。李、叶两人

来后与东海中学学生惠浴宇接上关系。三人在海州城外的白虎山上召开了秘密会议。在这次会上,成立了中共东海特别支部,由李超时任书记,叶子均任组织委员,惠浴宇任宣传委员。1929年初,东海特支改为东海县委,李超时任县委书记,杨光銮任组织部长,惠浴宇任宣传部长。委员先后有武同儒、姜子征、李少堂。

李超时,又名李振华,1906年出生于徐州邳州市李集镇柴庄村,1926年在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加入共产党。1929年7月,他遭国民党通缉,被迫离开海州,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通海特委书记、红十四军政委、军长。1931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拒不承认真正身份。最后敌人让在红十四军工作过的叛徒王益之来当堂指认。他愤怒地将桌上砚台猛砸叛徒。1931年9月19日,李超时壮烈牺牲于镇江北固山下。

叶子均,1906年出生,四川宜宾人。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来海州后,一直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离开连云港,返回南京中央军校供职,历任上尉区队副,步兵大队炮兵少校区队长,第十三期第二总队炮兵大队中校大队长。抗战爆发后,随校迁至成都,续任中央军校第十五期炮兵大队上校大队长,第二十期中央军校炮兵科上校科长。1948年7月任中央军校教育处少将高级教官。1949年秋随校去了台湾。

杨光銮,1901年出生于新浦区南城镇,后考取设在板浦的第八师范(后来的海州师范),192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临毕业时加入共产党。他受党的指派,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10月,由于敌人通缉,杨光銮被迫去了上海。在参加上海地下党纪念彭湃遇难一周年集会时不幸被捕。1930年秋天,杨光銮与其他同志一起被集体枪杀在上海龙华刑场。

惠浴宇,1909年7月出生在灌南县新安镇惠庄。1928年7月加入共产党。1929年6月,遭国民党通缉,离开连云港赴上海。1930年4月,

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逮捕。在苏州监狱、中央军人监狱中度过了7年牢狱生活。1938年4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惠浴宇受党组织的派遣,参加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历任新四军江南挺进纵队大队指导员、挺进纵队三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共苏中工委书记、苏北临时特委书记、苏北特委副书记、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警卫团政委、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三纵七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惠浴宇历任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苏南区党委委员,苏北行政公署主任、区党委常委,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通市委书记、市长,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华东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残酷迫害,蒙冤10年。1980年重新担任江苏省省长。1989年在南京去世。

武同儒,1904年出生于花果山下的大村。1928年秋,加入共产党。后任沭阳县委委员、城区区委书记。1930年7月31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8月3日深夜,惨遭国民党杀害。

姜子征,又名姜梦侠、姜培儒,徐州邳县薛集乡姜楼村人,1906年生。1928年初在南京加入共产党,历任中共东海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区委书记。1932年调中央苏区工作,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1933年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成员。1934年1月当选为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工作。1935年3月在赣南被捕。在监狱中他结识了方志敏同志。6月9日在南昌英勇就义。《方志敏文集》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记述了他临难不屈、悲壮就死的一幕。

李少堂,1901年出生,祖籍河南鹿邑。1928年秋,通过杨光銮同志介绍,加入共产党,不久被委任为东海县委军事委员,组织农民暴动。1930年春,暴动失利,他率一部分队伍转战赣榆,最后英勇战死在赣马镇城南。

李超时同志调离东海后,省委先后任命黄惠荣、贾从香、曹甦等为东海县委书记,范玉贤、刘秀文为组织委员,刘剑泉为宣传委员。冯硕仁、郇立学、董建华等先后为县委委员。

## 雪轩别墅

## 建于何吋

张树庄

墟沟北固山上有一座小洋楼,名曰雪轩别墅,又称望海楼、小望海楼。它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陈调元在墟沟建的私人别墅。因此又称陈小楼、陈家小楼。陈调元(1886~1943),字雪轩,河北安新人。1923年任江苏淮海镇守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1934年任军事参议院院长,1935年4月授陆军二级上将。

陈调元的这座小楼建于什么时候?《连云港市志·第五十三卷·文物篇》中对陈调元小楼作如下介绍:“陈调元小楼:位于连云区墟沟镇北

固山上。民国15年(1926年)白宝山建,后赠予陈调元,故名陈调元小楼。又因此可凭窗观海,故名望海楼。德籍工程师设计,全石结构。占地363平方米,为中欧古典别墅式建筑。前有停车场、行车石路及石门等附属建筑。至今保存完好。”这一资料应该来源于1979年我市的第二次文物普查,当时的报刊上多有载述。《苍梧晚报》2012年1月31日A3版有一篇《省级文保再添“港城十二钗”》的文章,报道陈调元小楼已经被报批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了,令人欣慰。其

黄惠荣,工人出身,由于担任县委书记毫无工作业绩,不能担当重任,1930年1月,被省委撤销职务。贾从香,为不识字的中农,任书记仅仅6个月,即被免职。曹甦,被捕后叛变。

范玉贤,徐州邳县李口村人。1926年12月,任中共邳县支部书记。1928年9月,任邳县县委书记。1929年8月,调来东海工作,任东海县委组织委员。1934年在东海县被捕叛变,充当了国民党特务。解放后被捕,最后死于青海劳改农场。

刘秀文,又名刘士铭、刘俊莪。徐州邳县铁富乡人。1926年10月加入共产党。1933年5月,到沐阳东乡发动农民进行麦收斗争,被国民党捕获,后叛变,出卖党的机密,当上了国民党东海特务室主任。解放后死于青海劳改农场。

冯硕仁,1907年生于东海县白塔埠镇。1923年考入省立第十一中学。1928年8月,经同学惠浴宇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7月,任东

海行动委员会委员,领导了牛山暴动。暴动失败后,离开东海到江西苏区。1932年,他从江西回到南京,打入国民党军队,从事兵运工作。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写信给家中亲属,述说自己忠于共产主义,决不向反动派屈服的坚定信念。七八月间,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董建华,东海县房山镇人。1905年生,1927年经陈秀夫介绍加入共产党,是连云港地区早期共产党员之一。1929年7月遭国民党通缉后逃亡上海。1930年2月,他在参加一次示威集会时被捕,不久叛变。回海州后任东海县国民党常务执委,随之担任国民党灌云县、东海县、沭阳县县长,和共产党队伍多次交手。1949年去台后,担任国民党“国大代表”。1998年10月,在台北去世。

(作者单位:市委研究室城市处)

责任编辑 李清

中对陈调元小楼的建造时间的记述以及是谁建造等问题与之前所述完全一样。

陈调元小楼真的建于1926年吗？真的是白宝山建好赠送给陈调元的吗？答案是：否！那么到底建于什么时间？是谁出资兴建的？还得从白宝山与陈调元的关系说起。

陈调元与白宝山相识是在1914年。陈调元是河北省人，被直系军阀冯国璋网罗，随冯到南京。任江苏宪兵司令，驻南京，经常赴江苏各地视察公务，在应酬中认识了白宝山。李纯督苏时，陈调元与白宝山拜了把子，陈小白8岁，管白叫“大哥”。后来李纯任命陈调元为徐海镇守使，与白宝山的关系就特别密切了。陈调元在接管徐州的过程中，白宝山帮了他很大忙，从此二人为生死之交，终生互有影响。陈调元第一次来墟沟是在1926年5月25日。这一天，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为抵御北伐军的北上，联络苏北的各支军事力量，在墟沟北固山的白宝山大楼上，召集驻扎在江北的7个师长，依次为陈调元、马玉仁、郑君彦、彭绍敏、白宝山、杨德昭、朱时，商量对付北伐军。陈调元当时虽远在安徽，也被传来，这是因为他处在未来的前线之故。此后陈调元及家人时常来墟沟白家，住在白宝山大楼西北角的“逸斋”里。逸斋位于大楼西北方二百多米处的一个用竹篱围就的小院落，内有L形平房五六间，附厨房与卫生设备，十分幽雅。白宝山亲题“逸斋”二字，悬于门上。如今在逸斋旧址处建有一座储藏室。逸斋被戏称为“西伯利亚”，取其在此西北角之故。此房常借与自己起伏的高级客人。至今还有很多关于逸斋的记载。如1934年，以宋绮云为首的陕西各界连云港考察团在《陕西各界连云港考察记》中写道：“（白宝山）楼之北有雅室数间，题曰‘逸斋’”。1935年，易君左一行到连云港视察，易君左著有《横断中原记》，在“五月六日”这篇中写道：“晚宿别墅（指逸斋）中，距楼（指白宝山大楼）较远而僻静，余等呼之为西伯利亚。余与剑真兄同卧一室，悬恠南田（1633-1690，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画

一，张梦晋（明代书家）字一。夜深人静，自小窗窥望，渔灯映海，弦月飞天，此景幽绝。”陈调元及其长子陈度在陈调元小楼未建成时来墟沟就住在逸斋里。在大楼西南约二三十米处是网球场，那时是个时髦的设施，上层社会身份的标志，是专门为迎接陈家父子避暑游玩而建。

陈调元有五子一女，长子陈度，字伯权，1906年生。陈度从小娇惯，长大后，吃喝嫖无所不来，但不爱赌。在沪宁一带是有名的风流陈大少，后来在上海因与外号“康克令西施”的女店员同居生了一女，即后来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后来康克令西施与陈度闹翻，告到法院，陈调元请当时在上海挂牌当大律师的章士钊出面调停，最后，孩子无人抚养，只有章士钊自己抚养，于是起名章含之。1933年白宝山的儿子、儿媳妇到法国自费留学。此时，“康克令西施”的事情刚告一段落。陈调元因陈度无所事事，怕他在上海再惹祸，采取“易子而教”的方法，把陈大少交给白宝山“严加管教”，带到北固山白家大楼。陈大少带来他从窑子里新赎身的姨太太“牛少奶奶”，住到北固山的“逸斋”里，自己单另起伙。

住了不长时间，陈大少嫌逸斋太小，就撺掇陈调元赶紧动工建造“陈家大楼”，这就是现在的“望海楼”。此楼建造速度很快，1933年秋起建，1934年初建成。同时还在宿城乌龙沟里建了另一处小楼，名曰“陈度读书处”，也称陈小楼。这时，白宝山的孙子白化文已经5岁了，陈度成天带着白化文玩，此事白化文记忆犹新，在所著《我所了解的白宝山和陈调元》中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非常具体。白化文先生所著的《我所了解的白宝山和陈调元》2004年7月发表在政协连云港市委员会编的《连云港近现代人物》上，后又于2007年12月发表在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白化文先生的回忆录《负笈北京大学》上。看来这篇文章有些姗姗来迟了，故多数人没有读过，因此仍然按照早年的普查资料介绍雪轩别墅。

陈调元小楼的建造，得到白宝山很大的支



陈宗孟夫妇在陈调元小楼前留影

持,但绝不是白宝山建好送给陈调元的。因为此时白宝山已经下野,而陈调元正一帆风顺,经济收入自不待说,陈建这么一两座小楼不在话下,根本用不着白宝山资助。陈调元小楼与白家大楼一样,也是由德国工程师设计,全石结构,占地 363 平方米,为中欧古典式建筑,至今保存完好。陈调元命名为“雪轩别墅”,因与白家大楼相比邻,所以叫做陈小楼或陈家小楼。陈小楼可以凭轩望海,解放后部队住在这里,起名望海楼。与 1959 年建好、1961 年装修完毕的大望海楼相对应,所以群众都称之为小望海楼。

十年前,雪轩别墅重新装修,当时一位负责装修的人,是墟沟陈陶庄人,姓陈,知道我对地方历史有所研究,特地打电话向我咨询,询问该楼的一些情况,我把上面的话向这位姓陈的说了一遍。后来,我到雪轩别墅游玩,一看,楼南边的草地上竖了一块石头,上面刻有“雪轩别墅”几个字,还有一段文字说明,居然仍采用 1926 年建造之说,大概一座建筑时间越长越好,而且当时公布在报纸上的关于雪轩别墅的资料也只有建于 1926 年这一份,所以他们宁愿取其远,不愿取其近,我也只有遗憾罢了!

2008 年 3 月 12 日下午,我受连云区政协委托,接待了一组来自新加坡的客人,一行 10 人。这个旅行团的团长叫陈宗孟,是一位医生,又是新加坡画家协会的主席。陈宗孟来此是来寻根,来考察陈家旧居的。陈宗孟是陈调元二子陈序的女儿。陈序,字次公,1909 年生,曾留学英国,在海外娶了个有钱的华侨小姐,1941 年底归国到重庆,抗战胜利后任徐州铁路局副局长,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后被我军释放,又到海外去了。陈宗孟生于 1935 年,据她说,她是大楼盖好的第二年生的,儿时曾在陈家小楼住过一段时间。陈宗孟到了三楼向东的阳台上,看大海悠远,港口繁忙,陈宗孟还是念叨记得当年这大海就在前边的山脚下,如今这海怎么退得那么远呢?后来我们又来到乐寿山庄,先看“逸斋”陈家旧居遗址,又看白宝山大楼遗址、八角井,最后来到“向若亭”。我吟了一首七律赠陈宗孟:

北固山中望海楼,已经七十四春秋。  
群峰推浪襟怀放,大港连云蒿目收。  
轩室聚谈文字在,石亭联唱墨痕留。  
寻根万里子孙愿,雪后梅香壮此游。

陈宗孟回新加坡后,于 4 月 18 日给我的信中还说:“在兴奋中也不无感慨,尤其是看到在‘海边’的房子,七十几年后竟然离海那么远了!”

此楼解放后一直为部队所有,成为师部的招待所。1958 年 9 月 20 日,刘少奇主席偕夫人王光美来墟沟时夜宿小望海楼。电视连续剧《她的代号白牡丹》,就将此楼作为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拍入该剧之中。如今,此楼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仍然由部队管理。部队对小望海楼的管理、维护相当负责,经重新装修后,外观未变,里面焕然一新,还有一间总统套间,显得雍容华贵,就连陈宗孟看了都啧啧称奇,赞叹不已。觉得 70 多年了,还保存得这么好!真是不容易!

(作者单位:连云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李清

# 北海观音寺

张茂田

北海观音寺位于南云台山主峰玉女峰东侧青峰顶北坡悬崖下,悬崖构殿,上傍绝壁,下临深壑,仿若天上宫阙,人间仙境。在其香火鼎盛时期,修真学道几近百人,可见此寺庙当年规模之巨。该寺庙毁于清顺治年间靖边裁海,现只存一片废墟遗址。此寺建于何时?史籍无载。其开山僧何人?州志、山志皆有记述,但各有其人,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相空,有的说是无相。相空何人?史籍无录。无相何人?乃明时毁家创建三元宫的山阳人谢淳,法名德正,号无相。



北海观音寺原址:后顶倒座崖

改开山僧相空为无相,从《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始

关于北海观音寺开山僧是谁的问题,我们先看一看本市一些地方文献上的记述吧。

《康熙海州志·杂祠》『北海观音寺』条:寺在清风头之后,面北,俗称为北海观音。白莺紫竹,常现云中。其开山僧相空立一石上,不避风雨,但食松枝,如是者三年。天下人朝礼之。后所立石旁生菩提一株,益见神异(《康熙海州志》116页)。

成书于清乾隆中叶的崔应阶《云台山志》『立禅石』条:在倒座崖侧。《赵续志》开山僧号相空,立一石上,不避风雨,但食松枝,如是者三年……(崔应阶《云台山志》32页)。

乾隆时举人孙斯位的《云台山赋》:“浮翠霭于后顶兮,曰倒座之阴崖……后有人其好鹤立兮,乃相空之在下。”

《嘉庆海州直隶志·寺观》『后顶观音寺』条:《陈志》一名倒座崖,在青峰顶之后,面北。俗称为北海观音。白莺紫竹,常观云中。开山僧无相,立山岩一石上,不避寒暑,但食松之三年(《嘉庆海州直

# 谁是开山僧



前顶三元宫

隶志》158页)。

《海州直隶州志》『立禅石』条:《崔志》在倒座崖。《赵志》开山僧德证空立一石上,不避风雨,但餐松枝,如是者三年……(同上 667页)

道光年间的《云台新志》『立禅石』条:在倒座崖侧。开山僧无相立一石上,不避风雨,但餐松枝,如是者三年……

在阅读这些记述的时候,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从《嘉庆州直隶州志》(以下简称《嘉庆志》)始,开山僧已由相空变为无相。两字之差,已非一人。曾参与编修《嘉庆海州直隶志》的许乔林所编修的《海州文献录》,成书于道光十六年的《云台新志》,皆引用《嘉庆志》说,并影响到近代的吴铁秋的《苍梧片影》,许绍蘧的《连云一瞥》,更影响到现代的各家志书。都只提无相,而无相空之名。从《嘉庆志》之《后顶观音寺》条和《立禅石》条字面上看,它的说法分别引自康熙时的《陈宣海州志》、乾隆时的《云台山志》和清初赵一琴的《续云台山志》。而事实上,《陈宣海州志》和乾隆时期的《云台山志》皆称后顶开山僧是相空而非无相。其中乾隆时的《云台山志》在本部分文前已列举。而《续云台山志》的作者赵一琴,明末清初人,顺治六年贡生,曾任无锡司训。顺治十七年参与海州志编修。在其《立禅石》诗中写道:“面壁九年犹有石,立禅三年只餐松。功成色相都空幻,只有菩提傍碧峰。”其中暗嵌“相空”二字。由此可见,在嘉庆之前,所有文字记载北海观音寺开山僧皆为相空。改相空为无相,首从《嘉庆志》始。

无相来三元宫时,北海观音寺已存在多年

“倒后顶,盖前顶。”这是花果山北麓新县山湾里老百姓中间流传了几百年的一句口语。直到现在,只要提起前顶、后顶来历,上了年纪的人都离不开这句口语。这也从侧面说明后顶的北海观音寺成寺时间早于前顶三元宫建筑群成寺时间。但北海观音寺建于何时,史籍无确切的记载。可是前顶的三元宫建筑群却有明确的载述。明张兆增《敕赐护国三元宫海宁禅寺碑记》:“云台山上旧有梵刹,创自唐朝,开山僧未知何人,……成化乙酉,有禅师自称鲁王孙,遂住此山取名清风。”(崔应阶《云台山志》69页)。明张朝瑞在《重修青峰顶大仙庵记》中写道:“庵之建造自宋皇祐四年,修庵者明成化乙酉有清风,弘治有戊午有净善,嘉靖戊午、隆庆戊辰则老僧道融”(崔应阶《云台山志》65页)。海宁禅寺的前身大仙庵,在德证即无相前已初具规模。山阳人谢淳毁家建三元宫,得识高僧德连,皈依佛门,取名德证号无相。于明万历十四年接掌大仙庵即海宁禅寺,于万历十五年始建三元宫,至万历二十四年落成,历时九年。据史籍记载,修建三元宫,工程浩大,德证不但要打通层层官府关节,还要亲自去瓜州采购木材等建筑材料。当时正值海州地区大灾荒,德证以工代赈,兴工代役,活民无数。每日工地上竟有上万人在劳作,其管理工作是何等艰巨。在这9年当中,无相是不可能立禅石上苦站3年,只餐松枝的。以上所摘引的碑记撰写者张朝瑞,与僧德证是同时代的

本地人,曾参与《隆庆海州志》的编修。他的这些记述,当是可信的。他详细的描述了德证修建前顶的各寺庙宇。按理后顶观音寺的规模并不小于当时的大仙庵。如果德证修建了后顶北海观音寺,张朝瑞不会只字不提的。而另一位与德证同时代的本地人,即撰写《云台山志》的顾乾,在他的无相禅师传中,也未提及修建后顶观音寺之事。

由此可见,前顶三元宫的开山僧是无相即德证。再者,按“倒后顶,盖前顶”说法,无相来三元宫时,北海观音寺不知有存在多少年,他又怎能是北海观音寺的开山僧呢?

#### 《嘉庆志》等不仅换了观音寺开山僧, 还将相空的传人列入天相的名下

千百年来,儒家的传宗接代,派系承嗣观念在民间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家族、宗派无不制定谱系字列,用以维系本家族、本宗派的亲疏远近。作为出家人的僧侣,同样也逃不出如此习俗。各宗各房都制定有一整套宗派嗣系谱牒。因各宗的传承不同,各派的传承位次相当分明。《花果山志》载:“海宁禅寺祖堂,宗派嗣谱系法序次位的行字,原三十二字(略)后续十六字:智慧清静、道德圆明、真性如海、寂照普通(《花果山志》183页)。”从中可以看出明代三元宫海宁禅寺僧人的辈份关系。明张朝瑞在《重修青峰顶大仙庵记》中写道:“……修庵者明成化乙酉有清风,弘治戊午有净善,嘉靖戊午、隆庆戊辰则老僧通融。”在《东海三元庙碑记》中写道:“住持僧德连圆寂,其徒园林、园景、圆松则皈依德证。”明张兆增在《刺护国三元宫海宁禅寺碑记》中写道:“成化乙酉,有禅师自称鲁王孙,过而乐之。遂住此山,取名清风。嗣法者曰净善,嗣善者曰通融,嗣融者曰德连。融年百岁。时有客谢淳自淮上来谒,连公一接手即深相契。更其名曰德证。于万历十四年,忽一日,呼其徒园林、圆松语之曰:我今幻身将掷,汝等可师事谢(崔应阶《云台山志》69页)。”明顾乾的《云台山志》中的《无相上人传附开山高僧小传》中详细的记述了园林等四人协助其师德证开山事迹。在《僧园福》条中:“僧园福,早失怙持,即登顶披剃,苦行其修,同诸佛典。且古貌古心,精严戒律,导引明

玉、明睿、明空、明镇、明灿辈,卓冠沙门(崔应阶《云台山志》81页)。”从上可以看出他们在海宁禅寺谱系字列中的位置。后续十六字第三位“清”字,第五位“道”字,第六位“德”字,第七位“圆”字,第八位“明”字……而后顶开山僧相空,其徒有“悠闲会果庆,又有越凡讳果满。修真学道,徒近百人(《康熙海州志》116页)。”“果”字辈在海宁禅寺系谱字中,显然是不可能存在于后续十六字第三代清风后的位置中。但《嘉庆志》在《寺观·立禅条》中,却言“……接其(指无相)传者果庆、果满。”硬是把相空系谱字埒中的果字辈塞进无相的系谱字埒里。与《青峰顶大仙庵记》、《东海三元宫碑记》、《赐三元宫海宁禅寺碑记》等文献明显不符。而成书于道光十六年的谢元淮主编的《云台新志》又把果庆、果满塞到了“圆”字辈下面:“其佐无相开山者为园林、圆松、园景、园福。皆德连之弟子,其后有果庆、果满,戒律勤苦,其徒弟常数百人。又有明玉、明睿、明空、明灿辈,能传无相衣钵(《云台新志从谭无相》)。”而顾乾在《无相上人传附众妙开山小传》中,根本就未提果庆、果满之名。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出,《嘉庆志》等在撰写相空和无相及其传人系谱字埒方面存在着一些混乱。

#### 相空、无相是两个独立存在的高僧

明人鲁问昭在《赠无相上人》诗中写道:“涉历江湖亦有年,俗情消尽悟真诠。金仙礼罢无余事,一卷楞严了俗情。”是说谢淳在江湖经商多年,在云台山上悟得真谛,抛俗皈佛,礼敬三元,毁家建庙,使云台山大放毫光,心满志得,一卷楞严经求证正果。而同时代的明人倪文纯在《寄后顶立禅上人》诗中:“明心须抱非非想,学佛宜登上上乘。石壁潮音皆道侣,南无不念亦为僧。”明白的告诉我们:立禅上人独占山岩,修真悟道,视绝壁为同道,听潮音为伴侣。苦站三年,只餐松枝,不念经,不礼佛,征得菩提树生,终成正果。这一赠一寄的二首绝句。可以清楚看出这两种不同修炼手段的高僧无相与立禅上人,非是一人。它更能够说明后顶北海观音寺开山僧立禅上人即相空而不是无相。

(作者通联地址:开发区朝阳镇刘巷村)

责任编辑 邱仕明



一来到江苏省东海县，便邂逅了“东海三宝”之一水晶。所到之处，我们耳闻目睹最多的便是水晶。在挤满成排成列水晶货摊的东海水晶大集上，500多米长、200多米宽的大街，就像一条流动的水晶河，摩肩接踵的买者卖者，便是河上波连波的浪；走进晶光灿烂、千姿百态，集各种水晶于一堂的400多家连成一片的水晶店，就像看到了水晶的海，那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顾客，就像下海捞珠的人；打开一本本精美华丽的水晶画册，就像在听诵一城水晶的诗、看绽一城水晶的花；水晶博物馆、水晶塔，那最近落成的现代化智能化建筑，就像几亿年前的水晶穿上了现代的华服；水晶博览会、水晶诗歌节、水晶精品研究、水晶珍品拍卖、水晶文化研讨、水晶主题创作、水晶网站等等，如盛开的百花，把东海水晶点染得春色满园。

水晶，水晶，水晶！水晶满东海，东海成了“水晶城”、“水晶大世界”！我们止不住在心中赞叹：

精彩——水晶！晶彩——东海！

### 水晶——东海人的骄傲

东海人是值得骄傲的。东海得天独厚，盛产水晶，其储量约30万吨，占全国水晶储量的70%以上，含硅量达99.99%，被誉为“中国水晶之都”，“东海水晶甲天下”。

东海人是值得骄傲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的水晶棺，就是经过在几个省市的筛选中，最后选定东海的水晶熔炼而成。现存于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三吨半的“中国水晶大王”也产自东海。这是东海农民在上个世纪50年代，怀着发现宝藏的欣喜和自豪，怀着对祖国的敬意和热爱，将巨石送上北上的列车，送到了北京城。

东海人是值得骄傲的。小小东海县，20多年来，先后迎来几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省部委政要及解放军的将军，他们关注东海水晶的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注水晶文化艺术的升华和创新。

东海人是值得骄傲的。短短20年时间，东海水晶由“大白菜”式的叫卖原生矿产和私人家庭小作坊、仅仅生

产水晶眼镜和水晶项链等简单的水晶物件,发展成现在拥有全国最大的水晶交易专业市场,并成为世界重要的水晶集散地,形成水晶珍藏品、水晶工艺品和水晶时尚品三大类拳头产品,年接待顾客逾百万。

东海人是值得骄傲的。自1991年以来,这里已举办了11届国际水晶节。东海人“以水晶为媒介,让世界了解东海;以水晶为桥梁,让东海走向世界;以水晶为纽带,连接五湖四海”。千万名海内外客商涌进东海,扩大了东海的影响,提高了东海的知名度,促进了广泛的对外交流,打响了东海水晶品牌,推动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让东海百万民众有了自己的狂欢节!

东海人是值得骄傲的。2011年东海举办了首届《祝福东海·水晶杯》全国诗歌大赛。历时三个月,共收到参赛诗作1500多首,出版了诗歌大赛获奖作品《晶都雅韵》。诗歌节期间吸引了全国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投来的500多首歌颂、赞美水晶的诗、词、赋。诗歌节把东海水晶诗化、幻化、美化,把东海水晶浸润在情与爱、梦幻和哲理的诗海之中,让东海水晶插上诗姑娘美丽的翅膀,飞向山南海北。

### 水晶——东海人的智慧

用智慧发现水晶之美。人们常说,我们的生活中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善于发现美的人。东海就不缺少发现水晶之美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发现水晶之美,并把这种美展现给人们,珍藏给历史。

朱景强原是东海县一名中学生物老师。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了10年老师的他,家里还买不起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逢年过节,年幼的儿子跑到邻居家去看彩色电视,深夜不回。这对朱景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发誓:三年买彩电,五年买冰箱。如何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此时的东海水晶产业已开始快速发展,不少人因此致富。朱景强也瞄准了这个方向。他用300元买了一台项链机,聘请一个亲戚开始加工水晶项链,没想到当年年底就添置了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

在一个东海水晶大集的日子,朱景强正好

没课。他来到集市溜达。在一个小摊前,他意外地发现一块形态独特的水晶石,透过外壳朝内望去,有一种特别的状况让他内心一阵冲动。这块被一般人误认为是“杂质水晶”,不值一文的“石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300克重,要价20元,以12元成交。

回到家里,朱景强反复观赏。看着看着,他发现石头里面呈现出的是:茫茫宇宙间,一颗彗星划破苍穹,正向无垠的太空急驰而去。那丝丝金色光芒熠熠生辉,美得令人震撼。他惊叫:“哈雷彗星!哈雷彗星!”

朱景强请一位手艺高超的水晶工艺制作师傅对其进行加工,一颗形态逼真的稀世珍宝天然水晶“哈雷彗星”诞生了!在郑州、南京,这颗水晶先后被出价6000美元、1万美元。

12元到1万美元!简直是天方夜谭。

“哈雷彗星”出了名,朱景强出了名。他被称为东海发现“水晶观赏石的鼻祖”。他没有止步,而是更加注重文学、艺术素养的提高,练就一双“点石为金”的慧眼,不断发现、购买、收藏新的水晶观赏石珍品、奇品,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石激起千层浪。“水晶里有景,水晶里有奇”,“收藏景石、奇石能观赏,能增值”,东海水晶市场迅速刮起奇石收藏热。朱景强又被誉为内地“水晶观赏石收藏第一人”。

20多年过去了,朱景强已收藏了数千件价值难以评估的水晶观赏石,出版了精品画册十余种,开创了《水晶宫》网站,开设了全国水晶连锁店。年富力强的他,早已不再为彩电、冰箱发愁,只想用他的智慧、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做美化人类生活的领先者”。

用智慧创造水晶之美。冯寿干老先生是东海县“用智慧的双手和智慧的大脑”创造水晶之美的奇人。年近七旬的冯寿干先生是江苏省授予的“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

上世纪90年代初,东海县的“水晶热”感染了这位“知天命”之年的艺术家。冯寿干把握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全身心投入到新开创的水晶艺术生涯中,并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打开《艺梦晶缘》画册,那色彩斑斓、琳琅满

目的一件件水晶艺术珍品，让我们啧啧叫好称奇。用专家的话说是“演绎出满目的神奇和璀璨”。那以诗画相配的“水晶观赏石”，晶莹剔透，山水云霞，春花秋月，让人尽饱眼福；配诗更让人进入石中幽深的意境。那因色设计、精雕而成的“天然水晶雕刻摆件”，在国内工艺美术博览会上竟有几十件分获金、银、铜奖。不能不让人对老先生的这把“刀”和智慧、辛勤和辛劳充满敬仰和敬佩。

那再现自然风光、人物、花鸟鱼虫的“天然观赏石补景画”和“天然彩色水晶画”，让人看到冯老先生精心构思、精心制作，将美术天才和奇石艺术相融交汇、相得益彰的深厚功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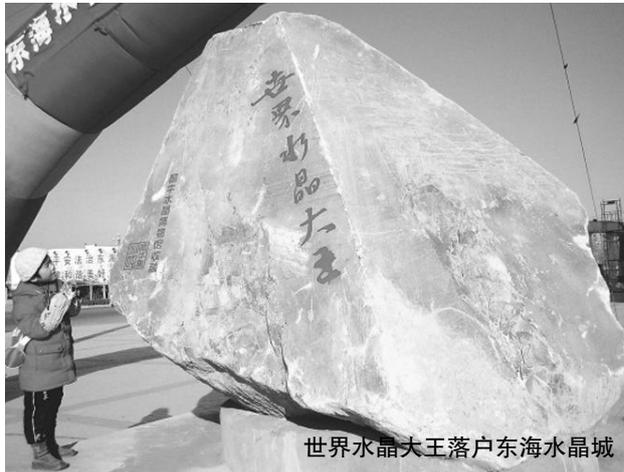
最让人拍手称奇的是“‘西天取经’圆梦棋”。这是冯寿干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开发的水晶娱乐棋谱。这个棋谱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尤其对中老年人更为合适。

冯寿干开辟的水晶艺术创业之路，“晶彩”辉煌：先后开发出水晶工艺新品种 9 项，6 项获国家专利。各类水晶艺术品获省级奖项 30 余项；带领水晶班学员创作的作品获省级奖项 80 余项，国家级奖项 40 余项。

如今，作为江苏省东海水晶工艺学校名誉校长的冯寿干，正把他在水晶艺术方面的智慧和经验，无私地传授给年轻一代，让东海的水晶艺术后继有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 水晶——东海人的“钱”程

爱心引领幸福“钱”程。沉睡在地下亿万



世界水晶大王落户东海水晶城

的水晶，想不到会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东海大地开辟了一条幸福的“钱”程。引领东海人走上这条致富路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水晶大姐吴兆娥。

吴兆娥是东海县牛山村人。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她是县国营 105 矿一名干过选矿、研磨、质检的工人。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矿上生产不景气，工人收入很低，有时甚至还发不出工资。吴兆娥想，与其 3 个人争一碗饭吃，还不如自己出来闯一闯，留个饭碗给别人。她不顾矿领导和亲朋好友怕她丢掉“铁饭碗”的好心劝阻，毅然决定停薪留职。利用自己对水晶的了解，开始试验磨制水晶项链。

吴兆娥没有磨制过水晶项链，她就边干边琢磨。由于是初学，更不了解自制机器的性能，她记不得熬过多少夜晚、磨破多少次手指，更记不清前前后后失败多少次。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终于打磨出第一批合格产品。望着自己用心血生产的晶莹剔透的水晶项链，昔日的苦和累化作了开心的微笑。

产品出来了，怎么卖出去？吴兆娥愁得睡不着觉。销售产品过程中的苦涩和甘甜，吴兆娥永远也忘不了。

她不会忘记，第一次乘火车去城里找亲戚帮忙销售项链，还送上 10 斤鸡蛋。不料被亲戚一口拒绝。她悻悻地离开亲戚家。紧随其后，亲戚赶到车站把鸡蛋还给她。吴兆娥尴尬、委屈，泪水簌簌地流。

她不会忘记，1991 年，嘉兴的一位朋友电话约她带上水晶项链样品去和美国客商洽谈。她换乘几次车，到嘉兴已是傍晚。天下着雨，朋友出差未归，无人接她。找宾馆不是因为贵住不起，就是客满。一连找了十几家也没找到合适的。夜深了，肚子饿、身上凉，脸上的泪水、雨水流在一起。

她更不会忘记，一位好心朋友介绍她到市里的一个大型会议上去推销项链。没见过大世面的她，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会上。没想到在会议休息的片刻，她带去的 80 条水晶项链全部卖光。每条 95 元，一下子收回 7600 元！这么多钱，比她在矿上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呀！她兴奋，她激动。她跃跃欲试，再攀新高峰。

吴兆娥趁势而上,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新产品,扩大销售渠道,经济效益一天比一天好。吴兆娥富了!她放弃了“铁饭碗”,端上了“金饭碗”。富起来的吴兆娥,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她所在的牛山村,农民还处在贫困线上。吴兆娥决心把自己研磨水晶的技术教给他们,好让大家早日脱贫致富。她免费办起水晶研磨培训班。在村农民夜校讲理论,带到家里机器上讲操作,手把手地教。经过几年的免费培训,使数以千计的农家姑娘、媳妇、大妈、大娘成了能工巧匠,牛山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水晶项链第一村”,东海成了闻名中外的“水晶之都”。

吴兆娥艰苦创业、关爱他人,而且诚实守信。一次,世界水晶专家澳大利亚的黄先生来厂参观时买了一些水晶制品,他走后,吴兆娥发现多出了100美元。她立即打电话联系,得知那位客人要乘飞机回国,她打的追到机场,把多收的100美元退给了那位客人。

吴兆娥44岁生日那天,已经富裕了的姐妹们纷纷把亲手精心制作的条条项链挂在她的脖子上。那长的、短的、粗的、细的、红的、绿的项链,在吴兆娥的胸前,闪闪发光,恰似“水晶大姐”光彩照人的水晶心。“水晶大姐”现在是拥有5个分厂、2个主营店、3个办事处、28个加盟店的东海海龙水晶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11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已将“提升中国水晶大姐品牌与水晶文化创意产品研发项目”作为引导扶持项目推广,并拨款100万元作为扶持资金。水晶大姐产品远销海内外,事业蒸蒸日上。

她的荣誉就像五光十色的项链,一串接一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她“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全国创业之星”、“全国光彩之星”、“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等等。

她艰苦创业的精神、引领众人致富的爱心,令人敬佩。

苦乐相伴异域觅“钱”程。“走四方,路迢迢,水茫茫,一国又一国,一矿又一矿”。篡改一下韩磊的《走四方》歌词,送给东海的异域“淘晶”人,似乎也还恰切。

东海现有水晶加工企业2000多家,年产2000多万件水晶饰品和500多万件水晶工艺品,水晶产品年交易额达70多亿元。随着水晶

产业的迅速发展,东海的水晶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为了科学合理利用水晶资源,东海县政府规定,不许个人随意私采水晶。为此,不少痴迷于水晶的东海人将目光转向海外,走出国门,追寻着水晶的光亮,去“淘晶”觅“钱”程。他们把淘回来的水晶在东海加工成水晶制品,再卖给世界各国,构成了东海与国际携手的“世界水晶产业链”。

段根银就是海外“淘晶”人中的一员。1989年,刚过20岁的段根银经朋友介绍,只身踏上出国“淘晶”之路。他先去越南,住在南方一个偏僻山村。睡的是农家简陋房舍的地板,蚊虫叮咬,彻夜难眠。吃的更差,半个月几乎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其间一共收购了几百斤水晶矿石,运回东海加工成眼镜,却卖不出去。这一下他亏了5万多元。

年轻气盛的段根银,没有被第一次的失败吓退。在语言不通、生活迥异的异国他乡,经过千辛万苦,段根银终于成功了!

和“水晶大姐”一样,富裕起来的段根银带领更多的人共同富裕。现在,他的事业发展很顺利,成立了一个有200多人的公司,他是董事长,也是东海水晶协会巴西分会会长。

20多年来,段根银先后带领60多人到海外“淘晶”。他们个个都富了,对此,段根银很开心。他表示,还要帮助更多的人奔幸福的水晶“钱”程。

如今,东海的海外“淘晶”人,成年累月奔波在世界各地。这些“淘晶”人,用辛勤的汗水,为东海的水晶产业增添辉煌。他们和全县20万从事水晶事业的人一起,撑起了东海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在东海的4天时间里,我们陶醉在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水晶世界里;我们对那些别具智慧的人充满了敬慕,对那些心衔明月、爱心的人十分敬仰,对那些漂洋过海、勇闯天涯的人无比敬重;我们骄傲着东海人的骄傲,幸福着东海人的幸福;我们真想用东海高高的水晶塔为笔,以东海美丽的西双湖水为墨,在泛着水晶光芒的东海大地上写下:

精彩——水晶! 晶彩——东海!

(转载于《人民日报》3月24日)

# 老书记亲自撰文稿

许燕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淮北盐务局和连云港市委办公室干秘书工作多年，和领导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学习了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收获匪浅。有几位老书记亲自撰写文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 田诚的腹稿

田诚同志，山东临沂人，1921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曾任徐州市工业局长、党委书记、常州市委副书记、镇江地委副书记、江苏省委交通部副部长，1960年底调来我市任市委第一书记，1972年起历任江苏省工交办副主任、省经委主任等职，1992年6月在南京去世。

田诚书记在连云港工作期间，没有固定的专职秘书，在职的几位秘书分为城市组、农村组和秘书组。书记要出行，根据工作需要，由办公室主任临时指派秘书随同。我属于城市组，曾有几回跟随田诚书记到基层去视察和调研。

1961年市政协召开第三届委员会，书记要致开幕辞，办公室主任侯文泉要我准备稿子，供书记参阅。我精心准备，拟好文稿送到田书记手中。第二天田书记把稿子送回来，要我重抄一遍。我仔细一看，原稿只用头尾几句话，主要内容全改了，实际这个开幕辞是田书记自己写的。

1962年，在原草棚球场（市百货公司对面）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到会有1000多人，田书记要去作报告。按常规，办公室应为他准备个讲稿，可他坚持不要，自己只写了半张纸的提纲，准备了腹稿，胸有成竹地在会上讲了两个多小

时。他的报告条理清晰，内容丰富，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而且没有文字稿，在全市领导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会后，根据大家的要求，市委办公室整理成记录稿，《同志，你向哪里去》印发到各基层单位学习。

## 祝斌为市报写社论

祝斌同志，江苏阜宁人，1920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1960年3月，祝斌从徐州地委的领导岗位，调来我市任市委副书记、市长。“文革”后，调盐城地委任副书记、盐城市政协主席。

祝斌同志调来我市时，住在老市委后院（原机关幼儿园驻地），办公与住宿连在一起。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后院办公的地方，将已写好的材料，大约有2000字左右，内容已记不清了，要我重抄一份。我并不知其用途，因他刚来不久，又初次接触，也不便多问。我按照他的吩咐，抄好后，他说这是报社要他写的文章，明天要发表，要我即刻送去。第二天的市报，以社论的形式一字不漏地发表了他的文章。

祝斌同志在我市工作期间，有些讲话、报告是他自己亲自撰写的。1962年初，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指示，市委召开了全市财贸三级干部会议，祝斌同志在会上作了《为谁服务》的报告，报告对商品走后门的表现、产生的环境和原因分析得透彻，对要不要堵后门，能不能堵后门，怎样堵后门讲得深刻，使全市干部职工深受教育。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中共连

云港市地方史》第二卷中有记载。

### 宋鲁峰自写讲稿

宋鲁峰同志，山东长青县人，1916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1952年任连云港港务局党委书记，1960年2月任连云港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副书记。1965年调任常州市副市长、常州市政协副主席。2009年3月在常州去世。

1960年，新海连市（连云港市前身）属徐州专区管辖。有一次我跟随市委副书记宋鲁峰到徐州专区开会。会议第一天是听取领导报告，第二天大会发言，当晚会上安排一场电影。我问宋书记有什么工作要我做，他说今晚要看看材料，让我去看电影。等到电影结束回来一看，宋书记仍在伏案写第二天的发言稿。当时徐州市为省辖市，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专区辖一市（新海连市）八县，第二天，专区唯一的一个市要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所以宋书记必须在前一天做好发言准备。我回来看到这个情况后很是内疚，当时宋书记很不介意，只是说，你在这个材料上添上几个数字就可以了。

又一次，上级来人检查工作，临时确定要宋书记去汇报，办公室准备材料已来不及了，宋书记就将时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闵振环和我找去，说今晚我们来个“三结合”，加个夜班，写个汇报材料。所谓“三结合”，就是他们俩商议怎么写，确定后，我在一旁做记录。由于我只作记录，不需要动脑子，深夜12点之后，就会打瞌睡，他们俩还不时地说些打趣的话，让我提提神，想到此事，真有点不好意思。

1961年夏，江苏省委召开各地市、各部门有关负责人会议，讨论如何克服困难，扭转经济发展停滞的局面，我跟随宋鲁峰书记到南京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一开就是25天，不时地举行大会，听报告，讲形势，摆问题，听发言，时而小组讨论，时而专题研究，探讨各种方案，与会人员饱尝了南京炎夏“火炉”的滋味。最后各地区、部门分工，写出专题上报材料，供中央研究参考。我市与省里一个部门合写一个手工业发展情况和改进的意见，宋鲁峰书记也是与我们一起从头至尾，字斟句酌地起草、修改这个专

题，直至最后成稿。

### 叶志俊向毛主席写报告

叶志俊同志，江苏沐阳人，1923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曾任淮北盐特区委书记，淮北盐务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连云港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调任省党史工委主任，1993年离休。

1955年5月的一天，盐务局办公室通知我参加局务会议。到会时，时任盐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叶志俊说，按照上级通知，局长室要有一名秘书协助局长做些具体工作，并指名要我担任局长室秘书。我当时才20周岁，又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自感任务重，难以胜任。参加会议的大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当场就有科长提出，秘书的年纪有点嫩了，是否合适。当时，党的民主气氛还比较浓，叶志俊书记，随即接受大家的意见，说：“那就叫局长室的许燕鏊同志吧！”从此，我就在局长室干起了秘书工作。

平日，我按照叶书记的要求，到各有关部门收集一些资料，供他参阅。但是他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稿，或撰写其他文稿，却从不要我办，都是亲自动手。一天，他把我带到盐场党委的一个小办公室，关起门来对我说，中央要求各大企业的领导都要向毛主席写工作报告，我们是部属大企业，当然不能例外。今天我们就来写这个报告。在小房间里就一张办公桌，我坐在他的对面，他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笔和纸，随即写起来，并且边写边说边征求我的意见，凸显领导人的实干、民主作风。大约一天多的时间，初稿写好后，我把文中空缺的数字，搜集齐全，填写进去，又重抄一遍，再交由叶书记修改上报。

1955年7月，毛主席对工业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要求各大企业，各个部门的领导直接向他汇报。1956年4月25日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这个可能就是叶志俊书记亲自向毛主席写报告的历史背景。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办）

责任编辑 张伟敏

# 难忘五年共事情

——忆老总编陈天柱同志  
张学贤



陈天柱

《连云港日报》老总编陈天柱同志去世已有两年多,我和天柱同志相识相交53年,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印象最深、难以忘怀的莫过于在报社五年共事(1983~1987)建立的深厚情谊。

## 一、推心置腹的交谈

1978年底,市委决定《连云港报》复刊,调我和杨锦涛同志担任副总编,委托我主持报社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突击,在人、财、物相当艰难的情况下,于1979年停刊的《连云港报》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复刊后的《连云港报》文章短、信息量大、图文并茂,受到机关领导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报纸复刊后,正好碰上机关机构改革。在两年多时间里,市委先后派三个工作组进驻报社调查研究,帮助工作。工作组撤出时,对报社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

1983年10月,机构改革正式开始,市委决定调陈天柱同志任报社总编辑(原任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周介达同志任第一副总编(原市委宣传部科长),我和锦涛同志继续任副总编。这本属正常的人事变动,但由于事前传闻较多,在市委领导和我谈话时,又没有说个一二三,让我感到很有压力,准备在交接工作之后,一定要把是非弄清。

天柱同志到任后,除了抓好工作安排,专门挤出时间和我两次交谈,询问我有什么想法,心里有什么苦水,不妨都说出来。我发现天柱同志真诚相待,就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并表明态度,是我的错误,虚心接受,给什么处分都行,不是我的错误,要求澄清,最好在全报社公开澄清。

当时,天柱同志耐心地听我的诉说,讲了许多宽心的话,大体有三点:一是报纸复刊后,成效显著,这是有目共睹的,谁也抹煞不了;二是报社的情况他也了解一些,总的形势很好,但也存在不安定因素,有人搬弄是非,企图把水搅浑,今后他会依靠市委尽力把是非曲直搞清楚;三是领导班子调整后,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比如报社内部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你和锦涛同志酝酿已久,还请你拿出主导意见。

由于天柱同志坦诚相待,推心置腹,我把个人委屈放到一边,尽心尽力地做好分管工作,在一年多时间相继协助天柱同志拟定编辑部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方案,很快获得市委宣传部、组织部批准;先后选拔四位懂技术、会管理、责任心强的老职工充实到印刷厂领导岗位,保证报纸印

刷和对外经营同步发展;组建广告部,拓宽报社创收的渠道;去北京请解放军报印刷厂派来三位机师帮助我们安装好报版轮转机(通称小高速),满足了市带县之后报纸发行快速增长的需要,同时也为报纸由周三刊发展到周六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二、创办电大新闻班

天柱同志在主政报社期间,很重视人才培养,除采取“请进来”(邀请外地专家学者到报社讲课)、“送出去”(派出人员参加各地培训班)之外,还和连云港电视大学合作,因陋就简地创办一期新闻专修班。课堂是借用一所小学的教室,时间安排在周末,教学人员除电大教师,还有报社周介达副总编和我,学员是来自报社和广播电台的编采人员,大都是没有受过新闻专业学习的高中生,总计有30余人。开课前,天柱同志作了具体交代,由于我四次从事新闻工作,天柱同志要求我讲授新闻理论时,多联系实际,以加深学员们的理解。

记得当年在讲授新闻定义时,我介绍了国内外的许多解释,最后庄重地向大家推荐了陆定一同志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的提法,即“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理论联系实际的授课方法,不仅受到学员们的好评,天柱同志听说以后,也给予热情的鼓励。

据了解,参加这期新闻班的学员的专业知识得到很大提高,后来普遍成为新闻单位的业务骨干。事后每想到此事,我都深深钦佩天柱同志重视人才培养,关注青年同志成长的战略眼光。

## 三、组织“新西游记”采访

1986年春,天柱同志根据老新闻工作者滕英同志的建议,并报请市委、市政府同意,组织一次大型异地采访活动,从1986年5月到1987年6月,先后组织12名编采人员(内有副总编3人,总编助理1人)分成5批,去陇海、兰新沿线五省的主要城市采访,详细介绍大西北地区的风土人情、历史名胜、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以及对连云港发展的期望。由于这次活动规模较大,时间较长,影响面较广,被誉为“新西游

记”。事后这组系列报道被评为江苏省1986年度好新闻一等奖。

在实施过程中,报社内外褒贬不一,主要忧虑是担心付出的人力、财力太多,正常报道和经济实力支撑不了。天柱同志审时度势,坚持搞下去,并不断总结经验,增强宣传报道的社会影响。

第一批报道任务由一位记者独立负责,采访的稿件质量很好,但声势不大。我和王绪年、李绪斌同志排在第二批,负责陕西、甘肃两省7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报道。临行前,天柱同志向我提出两点要求:一是除了抓好专题采访,还要主动拜会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介绍我们组织这次采访活动的目的、任务,连云港市和港口发展的现状和远景,以及为腹地搞好进出口服务的愿望,并听取他们对港口建设的要求和建议。二是报社经济较拮据,组织这次异地采访活动很不容易,能节省的钱尽量节省,但不要亏了身体。

我们遵照天柱同志的要求,并让绪斌同志买上一大包方便面和2斤榨菜就上路了。

在到达第一站西安时,我们除了和西安晚报的同志排出报道计划,准备第二天就进行采访活动,同时通过几条渠道和西安市政府办公室联系,表明拜会市长的愿望,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市长太忙,请耐心等待”。等到第五天,我们的专题采访任务基本完成,但还没有收到市府办的信息,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情况下,我们得到西安晚报一位专跑领导机关记者的支持,越过市府办,直奔丈八沟陕西宾馆,受到正在开会的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市长袁正中同志的热情接待,经过一个半小时的交谈,终于完成最后一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项采访任务。回到旅馆后,我们连夜赶写了两篇稿件,一篇是采访西安市市长约300字的快讯,通过邮电局用明码电报发出;另一篇是“市长纵论黄金道”的通讯,用挂号信发出,两篇稿件相继在连云港报刊登后,在全市引起很大反响,天柱同志兴奋地告诉我们,这个路子走对了,今后每到一个城市都要这样做。

当时,天柱同志由于远在济南的老母病危,没能亲自参加这次采访活动,但由于他能精心策划,合理调配力量,及时调整采访内容,使为

时13个月的异地采访活动(中间休整一段时间)得以坚持到底,并取得显著的成效:一是增强了连云港市在腹地的知名度;二是为加强连云港市和腹地的横向联合,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三是提高了记者异地采访活动的本领,为事后相继开展的“陆桥行”、“沿海万里行”等大型采访活动积累了经验。

#### 四、多次把好机会让给别人

报社调整班子后,正副总编增加到4人,工作量相对宽松不少,因此外出开会、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多了。当时,深圳是最令人向往的地方,新闻界许多活动都安排在广州、深圳,但天柱同志总是把机会让给别人,直到介达、锦涛和我先后参加深圳会议后,天柱同志才最后一个踏进深圳的大门。

报纸复刊初期我除了去南京参加宣传工作会议和评报会议,两次去北京联系转让轮转机之外,一般不轻易外出。调整领导班子后,天柱同志在四年中先后安排我到广州深圳、吉林延边、江西九江和浙江温州参加四次全国地市报纸经验交流会,学到了许多鲜活的管理经验,结交了一批新闻界的朋友,参观了闻名中外的一些名胜古迹,在祖国大好河山的熏陶下,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即兴撰写了“延边纪行”、“蓝天情思”和“九江揽胜”等散文和游记,一度疲惫的身心得到有效的调整。最值得欣慰的是,1984年夏在延边自治州参加全国广告经验交流会时,我有机会作了15分钟的即兴发言,受到同行的赞赏,常州、无锡、扬州等兄弟报社负责广告的同志纷纷主动和我握手,赞扬我思想开明。

还有一事也是让我念念不忘。1986年前后,新闻单位开始评定职称。当时评审条件要求较高,还有指标限制。天柱同志精心策划,初期先解决报社具有本科、大专学历的老新闻工作者,而后再努力解决中专学历的老新闻工作者。在我申报时,天柱同志特地派人到新华社南京分社和徐州日报社,请两位已具有副高职称的专家为我看材料,撰写推荐意见。在我调进广播电视局半年之后,终于拿到省职改办的主任编辑资格证书,而此时,天柱同志仍然按兵不动,我们都催促他抓紧申报,担心政策有变,他却漫不

经心地说,“不急,不急,等老同志都解决了,再忙我自己的也不迟”!据了解,直到1990年天柱同志才获得主任编辑职称。

#### 五、终生难忘的挚友

大约在1986年前后市委副书记李登先同志工作变动,临行前到报社告别,当时天柱同志约我和他一道接待李副书记。

李书记坦诚地说,我从徐州调连云港三四年,由于忙于事务,始终未能到报社看望大家,今天既是告别,也是当面向同志们检讨来的。听了李书记的开场白,我们很为感动。天柱同志接着向李书记汇报了《连云港报》创刊、停刊和复刊的一些情况,着重介绍了1979年初报纸复刊的详情,说明当时人手少、财力紧,难度相当大,学贤和锦涛带领大家克服困难,迎难而上。他们吃辛受苦打天下,我不费力的来坐天下,心中很为不安,今后还要加倍努力把报纸办好,把报社管理好。李书记听了介绍后,一再向我们表示慰问和感谢。事后,我细细回味了天柱同志和李登先书记的谈话内容,对“打天下”和“坐天下”的表述感到过重了,但也是肺腑之言,让我感到宽慰。

1988年初,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我两次服务长达11年之久的连云港报社和同甘共苦、亲如兄弟的同行,转岗到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局,而后在市委统战部退休。

忆往事,感慨不已,我庆幸一生交了许多挚友,天柱同志就是我心中一位终生难忘的挚友。

附:

#### 陈天柱同志简历

陈天柱同志1932年出生,山东济南市人,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转地方工作。先后任连云港市保险公司会计股长、市民路小学校长、《新海连日报》记者、组长、市委宣传部长、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连云港日报》总编辑、连云港市新闻学会会长、连云港市第七、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10月离休,2010年2月25日逝世,享年78岁。

(作者单位:市委统战部)

责任编辑 李清

# 我印象中的 刘洪石馆长

黄正明

刘洪石馆长离我们而去一年了，他那和蔼可亲、德高望重的身影时常在我脑海里显现。

其实，我认识刘馆长还不到十年。因我家住杨集，近几年又暂住天津，与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只能忆述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件事。

## 热心呵护新生力量

2000年前后，是连云港市文博研究人员变动较大的时期。有的离世，有的退休，有的退而不休继续研究；另有一批从文化教育岗位退休的人员，投其所好，选择研究我市的历史文物；还有一些中青年人爱上了文物考古，论文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成为一批新生力量。

刘洪石馆长在世时，对我们这些刚入门者总是热情接待，给予鼓励，指导我们要重证据，多考察研究，多查阅相关资料。2004年春，我带上《孔望山摩崖造像新考》初稿第一次登门求教时，刘馆长不但热情接待，和我长谈，翻阅初稿，留我吃饭，还叫我多看《汉书》和《后汉书》，又将他藏书中绘有公元元年（距今约2000年）前后印度人戴的覆杯状帽子的样式图案找给我看，作为辨别孔望山摩崖造像中那几位印度人造像的依据。并介绍去找《连云港史谭》杂志编辑部，争取在杂志上发表考证文章。

2010年5月，我从天津回连到他家时，刘洪石馆长对我说：“我现在主编《连云港历史文化》杂志，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名表扬了你们这批新生力量。”

## 执意坚持考古原则

2005年大约是在5月份，《苍梧晚报》刊登一则消息，说某人在外地开文博会议时，遇到一位来过连云港的考古专家，老朋友见面，谈得很投机。那位专家说，他是多年前在孔望山摩崖造

像处考察过，总觉得这里应该有字，就到处拍照片，回去后发现拍的石象左前腿后边位置的照片上有字迹，是“永平四年”。这则简短报道立刻轰动全市。年终评选市“2005年十大新闻”时还被列入候选名单中。

2005年7月份，第五届国际徐福节暨研讨会在赣榆召开，我和刘洪石馆长、侍述明书记住在赣榆县招待所同一房间中。我问刘馆长：“石象左前腿后边有字吗？”刘馆长表情冷淡地说：“是这样，文管会通知我和张传藻几人去，向我们说了这件事。”停顿一下又说：“连照片都未看到。”言外之意是怎能轻信。为此，我还特意去孔望山看了看，找到一些证据，否认有字的说法。并向负责十大新闻评选的领导人呈上我找到的证据。

刘馆长坚持实事求是的考古原则，使我的重证据的考古观念进一步增强了。

## 善于看待不同观点

考古研究方面，出现不同看法、不同观点是普遍存在、经常出现的事。例如将军崖岩画的凿刻年代，多数人考证认为距今7000年左右，也有人说距今只有4000年。至于孔望山摩崖造像的解读，分歧更大。说真的，刘馆长等人和我的某些观点也有分歧。但刘馆长并不摆老资格，而是主张百花齐放，各抒己见。他曾对我和蔼又认真地说：“你的观点，十年后也能是正确的。”

其实，刘洪石馆长和市内其他几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在一些具体文物的考证方面，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从未听到他在背后议论，而是相互尊重。有一次，一位学者筹备出一本书，已经请李洪甫教授写了序，又到刘馆长家想请刘馆长再写一篇序。刘馆长婉转地说：“有李教授写了，已经很好了，不需我再写了。如果你没请李教授写，我可以替你写。我们两个人随便哪一个写就可以了。”我想，刘馆长这样说，除了相互尊重外，还有为避免不同观点相撞的事出现。

## 倾情举荐文博才人

现任灌云县博物馆副馆长的陈龙山，家住侍庄乡农村，高中毕业。1980年前后在伊山公社砖厂当工人，在一次取土时发现了石棺墓遗物，及时上报，60多座石棺被保存下来，并被评定为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大伊山石棺墓的发现者陈龙山被县文化局安排在灌云县博物馆做馆员,一干就是二十年。在文物普查、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他还不断学习文物考古知识,撰写多篇论文,在各级报刊上发表,成为灌云小有名气的文物专家。2000年前后,县人事局招聘一批文化站长,陈龙山却因学历不够而落聘。更苦的是一连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生活难以维系,只好到书店去做临时工。

刘洪石馆长认为陈龙山是个难得的文博人才,除在有关领导跟前说情外,还在灌云电视台做专访节目。他语重心长地说:“没有陈龙山,就没有了大伊山石棺墓。”刘馆长的话,引起灌云县领导的重视,原副县长张琪可等人书面向县委报告,请求录用陈龙山。经调查研究后,先将陈龙山安排到大伊山风景区管委会做办公室主任,2010年春又调回灌云县博物馆任副馆长。此举,深受灌云广大干部群众好评。

### 辛勤耕耘的“老黄牛”

2010年5月,我应邀参加海州区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暨海州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前,海州区佛教协会会长和我交谈时,我说这次从天津回来是请刘洪石馆长为我的《古岩画探秘》文集写序的。这位会长说,这次研讨会也是依仗刘馆长的策划才搞成的。

据我所知,几十年来,刘洪石馆长参与与市县政府部门、各级机关单位、学术团体的文化建设规划、文物普查工作、研讨会议和各种活动的次数太多太多,无法计数。

多年来,他担任市建设局、民政局、新浦区、海州区、灌云博物馆、花果山景区、桃花涧景区等多个单位的顾问,对这些单位和地区的文化、旅游建设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做出了很大贡献。

刘洪石馆长的学术成就十分突出。他和同事合编了《连云港港史》、《彦涵研究》、《连云港风物志》、《连云港山海奇观》、《尹湾汉墓简牍》、《尹湾汉墓综合研究》;参与市委宣传部编写《连云港市文化丛书》、《古韵盛迹》、《品读连云港》等;单独写成《东海名郡》,为《花果山志》重新编写《宗教》、《文物》、《石刻》三章;还主编过《连云港历史文化》杂志。在《文物》、《考古》、《新观察》、《东南文化》等国

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和学术性文章20余篇,多次获国家、省、市社科奖。可以说,刘洪石馆长是连云港市文博工作中一位非常优秀、任劳任怨、辛勤耕耘的“老黄牛”。

### 平易近人的老专家

据市社科联、市文管会领导和广大文史爱好者说,刘洪石馆长虽是我市著名史志专家,但是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架子,也是最好请、最肯帮人忙的专家之一,我本人也有同感。

2009年国庆节,我从天津回连,请刘洪石馆长为我的拙书《连云港地区古岩画探秘》写序,他欣然同意了。2010年5月初,我去拿写好的“序”手稿时,刘馆长说:“近来身体不好,又忙于主编《连云港历史文化》杂志,还要应付各种会议,未能及早完成。为写这篇序,先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仔细通读了你放在这的全部书稿后才写成。”边说边将4页序文手稿递给我,他还谦虚地说:“你看行不行。”当时,我感激地连声说:“谢谢,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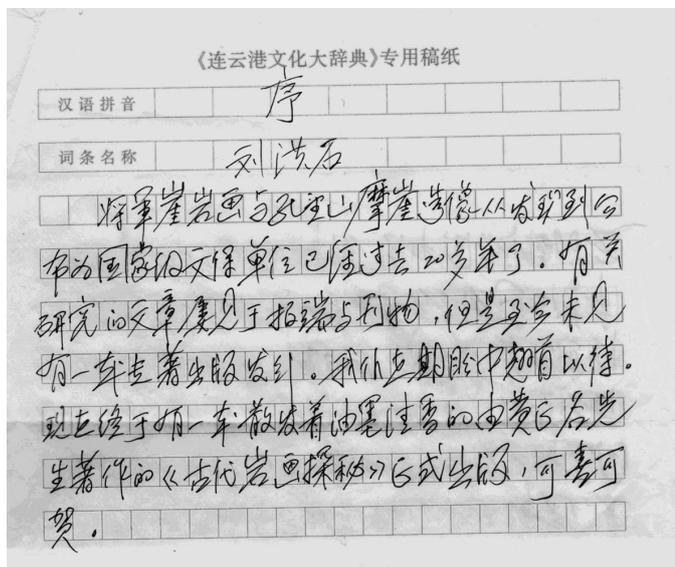
下面是刘洪石馆长为我《古岩画探秘》文集写的序中开头一段手写稿:

这篇序文手稿,已成了刘洪石馆长留在我处的宝贵纪念物,我将好好珍藏。

刘洪石馆长虽已走了,但他的学术论著还广存世间,成为无价之宝;他的高贵品德、敬业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者单位:灌云县杨集文化站)

责任编辑 李清



刘洪石手稿

# 东海县“水鬼”、“毛人” 事件的发生和平息

王宗富

1953年春天,苏鲁边界两侧的东海、新沂、沭阳、郯城、临沭等地相继出现了“水鬼”、“毛人”事件,由于阴森恐怖,流言不胫而走。东海境内,一时风声鹤唳。街头巷尾走亲串友,一开口,往往就是“水鬼”、“毛人”,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大大小小的乡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有的说,“水鬼”、“毛人”专门割大闺女的乳房,抠人的眼睛;有的说,“水鬼”、“毛人”专门掐青壮年的下身子,还好揭开人的脑壳,喝脑浆子;有的说,“水鬼”的铁指甲有1尺多长,“毛人”全身长着绿毛或红毛,走路一晃一晃的,它们速度跟刮风一样,眨眼之间就能来到你的眼前……

谣言蔓延,人心惶惶,有的村子上午不日上三竿不敢开门,下午太阳老高就没心思在地里干活了;农村的农贸集市日渐萧条,除了自己家急需,谁还敢冒着风险赶集上店;学校上课也不正常了,尤其是农村中小学,迟到早退的现象比比皆是,教师也无法管理……谣言升级,说蒋介石就要回来了,谁跟着共产党、跟着干部跑得紧,“水鬼”、“毛人”是一清二楚,首先就要找他们算账。到了五六月份,风声更大,群众的思想也更为紧张。北辰村(现属东海县南辰乡)一位青年,

由于天热,晚间在自家门口乘凉,从凉席上起来小便,人影晃动,被村内巡逻的民兵误以为是“水鬼”,举枪射击,腿被打断,造成终生残疾。南辰村一位正读小学的孩子夜间出来在磨(磨煎饼糊的石磨)道里小解,可巧被出来方便的父亲看见,父亲看花了眼,以为是“水鬼”来了,情急之下,举起磨棍便打了下去,打得儿子头破血流,严重脑震荡,养了一个多月的伤……此类误伤事件,在东海县内发生多起,造成很大的波动,真有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的味道。

暗藏的匪特和反革命分子、不法地主相互勾结,利用“水鬼”、“毛人”这一背景,四处活动,“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羽东区蔷薇村(现属驼峰乡)有个地主公开说:“时候到了,过些日子,非杀他妈穷鬼两缸血不可。”马陵山、羽山、磨山一带的残余土匪和特务,拦路抢劫,奸淫妇女。有的反革命分子还散布,“别看我穿着破茅窝(鞋),一定要打倒毛泽东”,“洋枪乒乒响,不久迎老蒋(蒋介石)”。这些人敌视新生的革命政权,他们彼此串通,臭味相投,笼络人心,拉帮结派,造谣破坏或扰乱社会治安,妄图颠覆人民政权。

社会敌情十分复杂,群众恐惧心理日益严重,无心耕种,无心买卖,无心从

事副业。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四月份,夜间,磨山区公粮被盗 900 斤,接二连三,临洪区两农户被偷走了耕牛两头,新民区一农户粮食全被扒走,家中看门的老妈妈被勒死,羽东区多户人家粮食、衣物被偷……消息传来,更渲染了紧张的氛围。

有的地主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公然藐视基层政权,借用群众的迷信心态以及家族观念,气势汹汹,妄图实施阶级报复。六月份,河南区一区委干部晚间到青湖村一带巡逻,一地主分子公然说,毛人来了,毛人来了!群众问哪有毛人,那地主说,就在眼前,那位穿白小褂的就是毛人变的,我算准了,要来祸害咱们村。并指挥不明真相的群众用铁叉叉那位干部。幸亏那位干部有勇有谋,一个箭步,跳出铁叉的包围圈,大喊一声:“你们谁敢上来!我是区里的助理员,地主的话,你们也能信吗?”在群众犹豫的片刻,他趁机撤走。

### 一、揭穿“水鬼”、“毛人”的真相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树欲静而风不止”“山雨欲来风满楼”,要想稳定社会秩序,推进经济发展,不揭穿“水鬼”、“毛人”的真相,群众不识破他们的庐山真面目,谣言就不会澄清,风浪就不会停息。

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东海县委、县政府要求各区、各乡要充分依靠党员、团员、基干民兵,放手发动群众,抓住苗头,理清线索,瞅准机会,果断出手,揭开谣言的谜底,掀开“水鬼”、“毛人”的盖头。

羽东区南榴镇,六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巡逻民兵发现村外有团火球,接着听到有尖厉的怪叫声,他们便急忙蹲到路旁的水沟里。不一会便发现有两个人翻穿着羊皮袄,屁股上牵着个高粱秸把子,高粱秸把子的后面拖着一小捆散开的麻,向村头上的两户人家跑去,一边怪叫,一边撞人家的门……他们这样做,既给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又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脚印被高粱秸及拖在后面的麻全扫没了)。民兵们抓住战机,鼓足勇气,一拥而上,把他们逮个正着。原来是两名漏网的残余匪特装扮的“毛人”,身上有刀、有手榴弹。

磨山区有五名残匪夜间翻披着狗皮,学鬼

叫,专门在村头上来回跳,好叫人看见。并在村头上点亮火把,他们在火光下抖动着身上的狗皮,俯俯仰仰,活像“毛人”。然后突然用大铁锅将火把罩住,往复几次,造成骇人的场面后,再转移到另外一个村头,继续作恶,这五名残匪被埋伏的干部、民兵抓捕后,为首者还恬不知耻地说:“你们敢逮我们,胆子可真是不小!”区长哈哈大笑说:“你们这是小儿把戏,见不得阳光,成不了气候,来几个抓几个!”

县委、县政府七月底及时召开会议,以这些被捉的“水鬼”、“毛人”为典型,并把他们用的羊皮、狗皮、麻等东西搬到了现场,使广大干部群众看清,“水鬼”、“毛人”是坏人,而不是什么神奇怪物,他们搞的那一套就是利用部分群众的迷信心理,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群众纷纷说,“水鬼”、“毛人”前些日子越传越神,越传越叫人害怕,真没想到,还是他们这帮东西兴的风,掀的浪,作的怪。

### 二、关键时刻要和群众站在一起

五六月份,“水鬼”、“毛人”的传说越演越烈,在这关键时刻,东海县委、县政府从县直各部门抽调干部 11 人(县委、县政府秘书各 1 人,人武部、公安局干部各 4 人,其他部门 1 人),分赴磨山、羽东、新民、临洪、河南等几个重点区,深入各村,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后来,根据需要,又抽调了好几批干部。他们根据上级争取、团结、教育群众,给群众撑腰,安定群众情绪,孤立打击反革命分子,促进生产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划清敌我界限,划清造谣与传谣、一般地主和不法地主的界限,明确在“水鬼”、“毛人”事件中一般从属和骨干分子的界限。他们在区委领导下,以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为主要力量,以事实为依据,教育发动群众,孤立打击敌人。至八月下旬,基本击退了谣言攻势,扭转了混乱的局面,全县恢复了正常秩序。

现年 90 多岁离休多年的老县长宗献瑞同志谈起这一幕,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形势逼人啊,“水鬼”、“毛人”传得那么凶,那么活灵活现,那么凶恶异常,你说群众心里能不紧张吗!我们下去,群众心里就有了定心丸。白天,我们抽空到学校里去看看,与孩子们座谈,跟他们说,“水鬼”、“毛人”全是骗人的,你们不要信,被

我们抓住的那几个,全是翻穿皮袄装扮的。他们是人,却憋着嗓子装鬼叫……这么一讲,孩子们就不害怕了。孩子们说,这样的话,我们回家也敢放心睡觉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下去的人还积极配合区委会,抓好宣传工作。首先把各村党团员、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指导他们结合实际,以多种形式在村内进行生动活泼的宣传,打消各家各户的思想顾虑及心理负担,使群众在纷纷扬扬的谣言中保持清醒的认识,不为谣言所左右。在临洪区黄圈村县公安局的干部还为村民编了两首顺口溜:

## (一)

“水鬼”“毛人”一阵风,敌特、土匪害人精,  
擦亮眼睛齐参战,当好国家主人公。

## (二)

“水鬼”“毛人”是谣传,用心险恶迫害咱,  
相信政府相信党,齐心协力搞生产。

对于一些“水鬼”、“毛人”闹得沸沸扬扬的村子,下去的干部和区委会一起,立即着手把各村的民兵组织整顿好,安排党团员和基干民兵夜间值班,分组巡逻,发现可疑情况,立即上报。

磨山区的县委下派干部是公安局的一位科长,他在夜间巡逻时,发现山西头村后面的大山沟里有点时明时灭的亮光,便带两位民兵悄悄摸了过去,看见是两个把脸涂上红红绿绿油彩的人正在沟边抽烟拉呱。于是瞅准机会,举起手枪,大喝一声,活捉了两个敌特,被传为佳话。敌特交代,再翻穿皮袄,群众已经不害怕了,于是改涂油彩,把脸画得黑一块、紫一块、绿一块,狰狞可怕,叫人人见了人人跑,谁知还未出师就栽了跟头。

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各级干部都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敢于克服困难站到斗争的第一线上,敢于挺身而出冒着风险和群众共同战斗,所以“水鬼”、“毛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在全县范围内,便被平息下去,实实在在地成了“短命鬼”,成了急流浪涛中的飞沫。

## 三、“夜校”、“识字班”遍地开花

“水鬼”、“毛人”事件之后,是年秋天,县、区都作了认真反思,他们发现凡是办有农民夜校或识字班的村子,在这次风浪中基本上都没有

受到大的干扰或冲击。青壮年农民在夜校或识字班里,学习上级的政策文件,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学习农村常用的汉字,既提升了政治上的坚定性,也大大提升了科技素养和识字水平。因而当谣言漫天而来时,这些青壮年农民基本不信谣、不传谣、不动摇,他们积极配合村里开展工作,站岗、巡逻,踊跃争先,成了村里的好助手、好帮手。

磨山区有位上夜校的青年小伙子,听说邻村他姐夫家突然间有了不少粮食,心有疑虑,便赶去询问缘由,姐夫说是趁讲“水鬼”、“毛人”的混乱,从临沭县大兴区偷来的。这位青年很明白事理,反复做姐夫的思想工作,使他终于明白,做这样的事,自己虽然不是“水鬼”、“毛人”,但到底还是掺和进去了,弄不好,也就犯了“水鬼”、“毛人”的罪。并和姐夫一起用独轮车把粮食又送了回去。

农民夜校或识字班成了那个时代农村的政治舞台,成了广大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学政治、学文化的重要阵地。

东海县委、县政府认真总结了这一新经验,并召开现场会,推广这一做法,促使广大农村在思想领域、文化领域、科技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冬天,东海县境内,农民夜校、识字班遍地开花,基本实现了“大村有,小村靠(上去),群众争先上夜校”的动人局面。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干事在总结中说:“夜校村村有,课本人人学,琅琅读书声,摇动星和月。”县委主要领导高兴地说:“‘水鬼’、‘毛人’这么一闹,没想到给我们闹出了这么个新局面!”

岁月沧桑,回首往事,我们倍加感到,在历史的伟大进程中,干部与时俱进,始终坚持和群众站在一起是多么重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谐的氛围对于经济的发展,对于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是多么重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对于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是多么重要;善于从大局着眼,敏锐地抓住还并不显眼的的新生事物,进而推而广之,使之成长、壮大,是多么重要。

(作者单位:东海县南辰中学)

责任编辑 张伟敏

# 火车时刻表见证陇海铁路的发展

张大强

2010年秋,连云港市民俗博物馆举办了一台名为“唤醒的记忆·连云港老照片”的展览。筹备过程中,征集到了一张上世纪30年代初陇海铁路行车时刻表。时刻表的主人杨军宁是位律师,平素喜爱研究地方邮戳,在网上“闲逛”时发现了这张时刻表,遂与卖家联系购得,后得知展览信息,遂将时刻表扫描成电子档送至民俗馆。展览过程中,很多人对这张时刻表很感兴趣,有的观众甚至为表中的某个地名而争执起来。

陇海铁路,别名陇秦豫海铁路。它的修建并非一日之功,从最初的汴洛铁路,到最后的天水兰州段,历经47年方才全线贯通(1905—1952年)。这张时刻表就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陇海铁路修筑过程。

时刻表大小与今天A4纸张尺寸相仿,繁体宋体字竖式排版,因年代久远,纸张微微发黄,但总体品相完好。在这张时刻表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年陇海铁路的站名、里程、发车时间、运行时间、票价。时刻表上并没有印制时间,但笔者推算,这张表发行在1932—1933年这个时间段内,因为时刻表东端的始发站为大浦,而非今天的连云港(1933年铁路修至连云港),西端

陇海鐵路行車時刻表

| (行東) 車 列 行 下 |       | (行西) 車 列 行 上 |       |
|--------------|-------|--------------|-------|
| 大浦           | 各站    | 各站           | 大浦    |
| 48           | 0,80  | 9            | 0,20  |
| 71           | 1,80  | 18           | 0,40  |
| 97           | 1,70  | 90           | 1,55  |
| 109          | 1,90  | 127          | 2,25  |
| 145          | 2,50  | 169          | 3,40  |
| 164          | 2,85  | 201          | 3,50  |
| 237          | 4,10  | 247          | 4,25  |
| 238          | 4,10  | 285          | 4,85  |
| 297          | 5,10  | 345          | 5,90  |
| 315          | 5,40  | 379          | 6,50  |
| 337          | 6,15  | 397          | 6,80  |
| 357          | 6,15  | 476          | 8,20  |
| 382          | 6,75  | 505          | 8,60  |
| 422          | 7,25  | 540          | 9,20  |
| 501          | 8,60  | 541          | 9,20  |
| 518          | 8,85  | 582          | 9,90  |
| 543          | 9,45  | 600          | 10,20 |
| 616          | 10,55 | 659          | 11,25 |
| 640          | 11,05 | 661          | 11,35 |
| 686          | 11,90 | 730          | 11,90 |
| 688          | 11,90 | 752          | 12,85 |
| 770          | 13,10 | 788          | 13,45 |
| 807          | 13,80 | 800          | 13,50 |
| 834          | 15,05 | 829          | 14,15 |
| 889          | 15,15 | 854          | 14,55 |
| 897          | 15,30 | 897          | 15,30 |

上世纪30年代初陇海铁路行车时刻表

始发站为潼关（灵宝至潼关段1930年11月开工，1931年12月竣工）。时刻表若是晚于这一时间，上面就会出现连云港、西安的站名（潼关至西安段1932年开工，1934年竣工）。

纵观整个时刻表，共有27个车站，分别是：大浦、新浦、海州、新安、运河、徐州府、铜山、黄口、砀山、商丘县、柳河、民权、开封、中牟、郑州南（北）、汜水、巩县、洛阳东（西）、澠池、观音堂、会兴、陕州、灵宝、潼关等。东、西起始站分别是大浦、潼关，整个行程897公里，票价15.3元。当时的火车速度很慢，早上6:25从大浦出发，下午15:47才到徐州。这时火车得进站停车，加煤加水，第二天才能动身，整个行程要停车三四次。

现在从连云港沿陇海线坐火车往西安，时刻表上的很多车站还停车，如：新浦、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澠池等；铜山、黄口、民权、中牟、汜水、会兴等站就不停了；有的车站甚至就消失了，如大浦、海州。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这张时刻表上车站的名字，它们也是陇海铁路发展的一个缩影。八十年前，尚没有连云港市的概念，作为一个新兴的商埠，新浦以“镇”的名义出现在陇海线铁路时刻表上，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新浦已经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是连云港市政府所在地，在时刻表上的名称也顺理成章的从“新浦镇”变成了“连云港”；大浦，曾经盛极一时的货运、商贸中心，因河道淤塞严重，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火车站的位置就没有了，现在成为港城的工业区；新沂，八十年前在时刻表上的名称叫新安，因为新安镇是新沂政府的驻地；邳县称作运河，是因为大运河的关系。因为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因，巩县并入巩义市而改作巩义，陕州改“州”为“县”，改作陕县，商丘县变成了商丘市，徐州府的“府”也被去掉了。东海则是后建的车站。

这些都是为人们熟悉的城市，还有一些小



一片废墟中的老海州火车站

站，今天虽不甚闻名，当年却也是水陆要津，如萧县的黄口镇，原名曹马集，是三国时期曹操养马的地方，原先是一片盐碱地，但因该镇地处苏、皖、豫、鲁四省交会之地，1915年，陇海铁路修到这里，并设立黄口站，带动了黄口的发展，现在，黄口镇已经成为皖北的一颗明珠。会兴镇位于三门峡北郊，晋、陕、豫三省交会之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交通便利，与黄河古渡茅津渡隔河相望，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理想投资宝地，当地俗称“小上海”，要不然陇海铁路也不会在此绕一个大弯了。时刻表上还有一处地名也颇令人感兴趣——“观音堂”，笔者以为找不到此处资料，上网搜了一下，没想到一下子蹦出个“观音堂煤矿”的条目，仔细一看，还真是陇海铁路上的观音堂。观音堂镇历史悠久，地处澠池、宜阳、洛宁三县接合部。盛产煤、铝、矾土、石英石、石灰石等矿产，因储量大、质地优，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在此设立火车站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黄口、观音堂的火车站还在继续使用。

现在全长1759公里的陇海铁路已经是贯穿中国东、中、西部最主要的铁路干线，也是从太平洋边的中国连云港至大西洋边的荷兰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连云港到徐州只要两个多小时，这是八十年前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作者单位：市民俗博物馆）

责任编辑 张伟敏

# 板中二女杰雕像

本刊编辑部

板中二女杰雕像位于板浦高级中学校园内。

雕像于1991年10月建成。原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炮兵政委张池明将军亲自为雕像题字。该雕像再现了张明、朱平二位女烈士的英姿。

张明(1920~1943),原名张永昌。朱平(1922~1942),原名朱芳。她们出生于板浦镇,1938年夏,毕业于灌云县初级中学(板浦)。

1939年3月4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板浦。4月6日,张明、朱平为寻求抗日救国道路,化装奔赴泰州。5月,在江都县吴家桥参加了新四军。后在新四军挺进纵队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惠浴宇等介绍下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学习。1940年初,被分配至军部直属印刷所工作。当年,她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平随军部突围。1月6日,在东流山战斗中被俘,囚于上饶集中营周田监狱。她在狱中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与特务、军警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2年6月23日,在集中营向闽北转移的途中,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省兴田县。

随军先期转移的张明于1941年1月中旬渡江北上,抵达重建的新四军盐城军部,被分配在阜宁县开展民运工作。1942年任新四军三师八旅政治部组织干事。1943年3月17日,张明在随新四军干部队赴延安学习途中,乘船经赣榆县小沙东海面时,与日军发生激烈的遭遇战。张明不幸中弹牺牲,葬于抗日山烈士陵园。



板中二女杰雕像

## 话说白虎山庙会

白虎山庙会是苏北鲁南地区规模较大的庙会，自清朝初年形成以来，历经 300 多年，至今长盛不衰。在这么长的岁月中，庙会的规模有大有小，会址时有变更，但其民间物资交流和宗教文化生活的的主要内容没有变。

◆ 孙大伟

### 起源

白虎山庙会，当地人称四月八会，其发源地是海州碧霞寺。碧霞寺原名碧霞宫，当地人俗称奶奶庙、南庙，始建于元泰定元年（1324 年），是一处供奉碧霞娘娘的道场。碧霞宫所在位于城南不到 200 米，前有朱雀石，后有玄武石，青龙涧在其东北侧蜿蜒西去，白虎山在其西侧，所谓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是一块风水宝地。后毁于兵火，废圮多年。明崇祯年间，寿极和尚（海州人、俗姓朱）佛学深湛，慧眼识珠，携弟子身居破庙，四处化缘，至清顺治年间（1644~1660 年）将其重新修复。其建筑为明末清初风格，庙门南向，山门前有一小型广场，一对石狮和两株银杏，沿山门中轴线向北，依次建有正殿、后殿及两侧的配殿。正殿即三霄殿，是供奉碧霞娘娘的道场，神台上塑有三霄（金霄、银霄、碧霄）的造像，为并立的三个雍容华贵、端庄的青年女子。左右殿柱上有源自泰山庙宇的楹联：日照碧霞金世界，月临泰岱玉乾坤。两侧神台上，供奉民间传说为民除疾、送子的痘疹、眼光、送子等八尊神像。后殿供奉佛主释迦牟尼。是当时通行的道观僧住、佛道合一的道场。

碧霞宫修复后，进香的人络绎不绝，香火旺盛。海州当时临海，不少渔民信奉碧霞娘娘是他们海上引航安全归来的保护神，因此出海打鱼要许愿，安全归来要还愿，都要到庙中进香；二是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加之人们迷信，大人小孩有病，便到庙中叩拜痘疹、眼光等神灵，祈求平安；三是海州地区佛教传入较早，民间信奉佛教

的人较多，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是佛主圣诞，碧霞宫要举行浴佛法会。所以届时前来拜佛进香的、求碧霞娘娘保佑航海安全的、求安祛病的各方信众汇聚碧霞宫，同时也带来了商机，官商士绅、渔樵农工、贩夫走卒云集，逐步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庙会。

### 变迁

清代重佛抑道，寺院供给富足。至清末，海州碧霞宫有庙田 1200 多亩，常住僧人 40 余人，淮北地区不少小庙的僧人也寄居于此“挂单”，多时达百人。这些僧人平时到民间做法事，更加重了碧霞宫在信众中的份量。因此，清代每年以碧霞宫为中心的白虎山庙会辐射范围很广，不但海属地区，甚至皖东北、徐州和鲁南地区的商贾都来赶会。庙会会期虽然定为三天，但是商贾及小贩们在农历四月初四就已经设摊售货，初九下午离去，会期实际都是五天。进香的人群，一般初六就开始抢“头香”，以示对神灵的虔诚；初八浴佛节当天，碧霞宫内进香的信众更是人满为患，热闹非凡。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 40 年代。

解放前夕，由于战火动乱，民生凋敝，碧霞宫内僧人大部分游离。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庙田被分给农民，僧人自食其力。1955 年在庙内办起了铁业社，碧霞宫内仅剩的一名本地僧人禅静法师返俗。因此，解放以后，白虎山庙会基本不再举办浴佛法会，只有零星香客造访，庙会的宗教活动不复存在，其主要内容是物资交流。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这个阶段处于国民经济恢复和调整时期,城乡物资交流活跃。白虎山庙会期间应市的小型农具和民用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各种商业交易仍以碧霞宫为中心,在其周围展开:出古城新南门经青龙涧上的水漫桥至碧霞宫的道路两侧,主要是饭店和一些临时摊点;碧霞宫西北的白虎山北坡及山下道路两侧,主要是蓑衣、斗笠及儿童的木制刀剑等玩具交易区;碧霞宫西侧白虎山南坡主要是犁、锄、镰刀、笆斗等农具交易区;碧霞宫东侧道路两旁为日用百货临时棚和摊点;东侧的空地上是杂技等民俗演出区;碧霞宫东侧道路的南段是出售床、桌、凳等木制家具的区域;碧霞宫东北角青龙涧内及岸上,是一些饭店、盆花苗木和小贩的流动摊点。

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持枪武斗,政府及工商联等瘫痪,无人出面组织,多年形成传统的赶会群众自发地将物资交流会场移入城内马路口等处,规模虽然小,但会期也有三天。1968年,两派武斗升级,直到1970年,庙会没有举办。

1971年,海州区革命委员会于5月1日至4日恢复举办白虎山物资交流大会。至1977年,物资交流大会的主会场仍在白虎山周围及城内部分地段。

1978年,鉴于白虎山周围相对狭小的地段制约了物资交流大会的规模,加之交通不便,熙攘的人群极易发生危险,海州区革命委员会将物资交流大会迁至幸福路举行,已不再有庙会的性质,纯属物资交流大会。此后,时逢改革开放,计划内商品逐步放开,到物资交流大会上交易的商品一年比一年丰富,上会交易的商品和人流也在世纪之交达到鼎盛时期,规模空前。2000年,物资交流大会的会期从5月7日到14日,长达8天,商品成交额达到7000万元。2001年更达到成交额8000万元,赶会人群100多万人次的最高记录。这个阶段,物资交流空前活跃。不但东海、赣榆、灌云、灌南、沭阳的商家参会,甚至山东、河南、安徽、浙江和上海的不少商家也运来商品参会,周围锦屏路、海孔路上车水马龙,前来赶会的农民一拨又一拨,绵延十多里,特别是初八正会这天,往往赶会的人群高达

二三十万人。大会的布局主要沿幸福路和新建路展开:海州中学到城雕的新建路段和城雕到幸福桥的幸福路段,是服装和日用百货交易区;幸福桥北到朝阳路的幸福路段,为生产资料、农具、家具交易区;城雕向东到海州师范学校的新建路段,为盆花和部分日用商品交易区;白虎山小商品市场对面为民俗、杂技表演区。

2003年,白虎山物资交流大会因“非典”而停办。2004年起,主办者开始对物资交流大会的形式和内容作调整:当年,会期改在“五一”长假期间(农历3月13~18日),会址以幸福桥为起点,经胸阳门广场南延至东风路。2005年起,认为在当前市场经济活跃形势下,大会已失去了物资交流的作用,影响城市环境和交通,干扰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予以停办,只保留庙会的民俗文化系列活动。2008年起,更名为白虎山文化旅游庙会,纳入“连云港之春”系列活动。2011年则将会场移至洪门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内举行。

### 传承

白虎山庙会走到今天,不论主办者对其会址和内容作如何调整,都是古城海州的一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庙会要传承下去,就要紧密结合当前海州地区的实际,让其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和百姓生活。笔者认为:以后举办庙会要名符其实。其内容,物资交流、宗教、民俗文化活动兼有,以满足各方面群众的需要。其名称,还应恢复为“白虎山庙会”,这项海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丢。其会址,可定在胸阳门广场周围、东风路、碧霞寺门前的南大街地段。以东风路和胸阳门广场作为物资交易区,胸阳门以北广场作民俗文化表演区,碧霞寺、百子庵内作宗教文化活动区。庙会期间,可在碧霞寺内恢复举办浴佛节(法会)。寺院内丹墀宽阔,有举办浴佛节的条件,这样既可恢复庙会的性质,满足信教群众对宗教文化生活的需要,也可利用这一节日作平台,邀请各方人士研讨海州地区经济和社会,为地方发展服务。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志办)  
责任编辑 张伟敏

## 古城海州的关帝庙

杨维英

去冬重返海州古城,曾去过关庙巷,那是我上中学时经常经过的地方,虽然事隔七十多年,仍然并不陌生。但周边景色,却变化不小。尤其是关帝庙不见了,已经成为居民小区的一部分。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宋淳祐三年,海州便建有“关圣庙”,地点是在离东海县城十三里的关东村。此“关圣庙”当然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见到的关帝庙。

后来的关帝庙,据说是在明末太监魏忠贤生祠遗址建成的。魏忠贤倒台后,生祠被扳倒,所有木料砖石等被劫一空。仅存一块空地,西南两面是街,东北两面是杨姓民居。当地人都希望杨家把这块地买去,杨家坚决不要,并且说,即使不要钱,也不会把这块地并到自己的院子里。于是这一临街地段,闲置在那里很长时间。后有人提出修建关帝庙的建议,当地士绅,以及城外碧霞宫的和尚,都很支持。不久,便建成前后三进的一套房子。就在房屋建成,着手请雕塑工为关羽塑像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地方上的一些秀才、举人提出意见,认为武圣庙不应居于孔庙上首,不能在文庙之左,大家认为有道理,于是给关羽塑像的事便停下来。山门修好了,也标明“关圣帝庙”,就是里面没有关羽的塑像。

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新的关庙离考棚很近,许多徽商、淮商便出钱把空闲的房屋租下来作为商铺,摆摊售货。徽商为胡开文、詹大省,淮商为张裕元等,每逢大比之年,都要运来大宗笔墨纸张在新建的关

庙内摆摊售货。后来一些徽商发现,四乡来应考的举子,获得功名的机会很小,但进城一趟,总要带点东西回去。于是徽商的商品,不再局限于文房四宝、茶叶等少数物品,有人便带来胭脂花粉,绫罗绸缎等,在市场上销售。直到科举制度废

除,关庙商铺才冷落下来。

房屋虽然闲置在那里,但地方上有什么事,也常会把它利用起来。如辛亥革命之后,各地纷纷宣布“光复”,海州知州陈宗雍便是在关庙内召集地方士绅,宣布“光复”的。因此,地方上都把关帝庙作为海州的光复纪念地,尤其是在1934年以后,江苏省教育厅在海州城办义务教育实验区,更以关庙为基地,一教区有主任一人,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各一人,在关庙内办公。另外有中心小学一所,有两个班,皆是单式。义教区另外还有三个小学,即东门街的文昌宫小学,西门街的老君堂小学,南门街的观音堂小学,皆是初小一至四的初级小学。直到1937年下半年,东海师范和东海义务教育实验区同时停办,关帝庙也成为民居了。

过去文武圣庙皆有所设“丁祭”,按礼是每年一次,但东海是一穷县,“丁祭”经费也出不起。从我记事一直到北伐大革命,孔庙“丁祭”次数要多一些。关圣庙的“丁祭”好像只有一次。那次关圣庙“丁祭”的主祭人是驻军司令白宝山,陪祭人是当时的东海县长。参加的人本来应当是武秀才、武举人及过去有功名的人,但这样的人当时已经很少,只有像文庙“丁祭”那样,用历届中学毕业生来充数而已。

(作者杨维英,1916年出生于海州。1934年毕业于东海中学。曾长期任教于淮阴中学。)

责任编辑 张伟敏

##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4-6)

本刊编辑部

###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等20人,代表党员994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陈独秀主持了会议,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维经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出席1924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先后在大会上讲话。各区、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的工作情况。

大会回顾了三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情况,肯定了上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以及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围绕着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等11个重要决议。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友、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警予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中共四大的主要缺点和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0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是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并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的整个基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并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大会代表在讨论过程中，以瞿秋白为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一定的批判，但并没有引起全体代表足够重视。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刘少奇、苏兆征、张太雷、阮啸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 31 人。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陈潭秋、陆沉、黄平、李振瀛、袁达时、林育南、吴雨铭等 14 人。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 7 人、候补委员 3 人组成。

中共五大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告别是如何建立党

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共有 142 人。会议的主要报告有：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报告。会议共通过政治、军事、组织、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和职工运动等 14 项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前的政治形势正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会议还制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十大政纲；规定了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

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出中央委员 23 人、候补中央委员 13 人，组成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由 3 名委员、2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7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